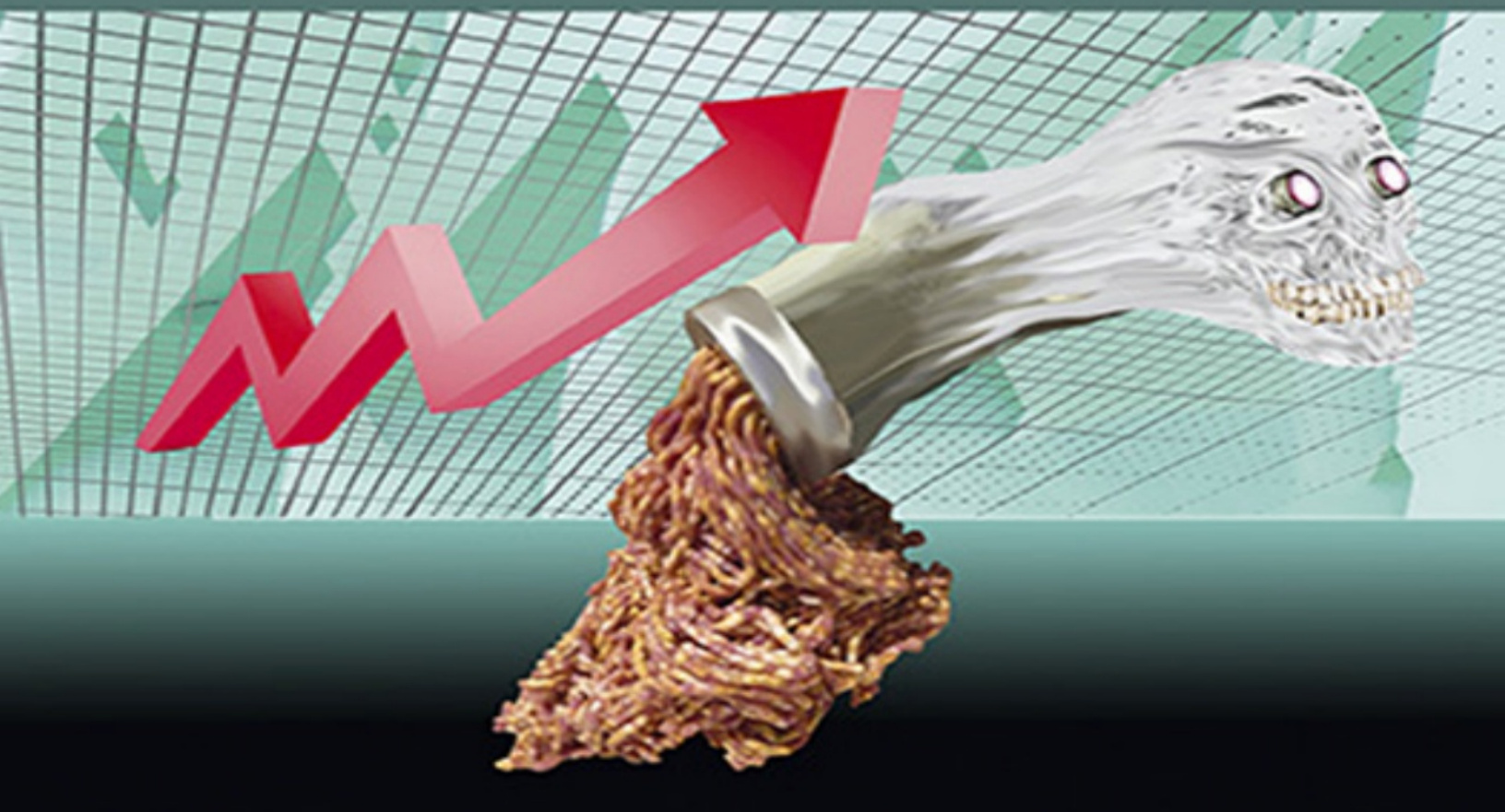
[redacted]

本杰明·诺伊是一名男子

[redacted]

阿赫勒主义和笔记本主义

[redacted]



人们在说什么

恶性速度

总是去疆域化!最近的“加速主义”理论就是这么说的。醉酒对抗醉酒，精神分裂症对抗精神分裂症，谵妄对抗谵妄——千禧年生活中的加速主义倾向在这本简明的书中被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作者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从历史上的先锋派，到底特律的科技和科幻小说，再到尼克·兰德和控制论文化研究单位(CCRU)，本杰明·诺伊斯揭示了对速度的意识形态幻想。他总结道，我们应该摒弃加速主义的资本主义情结，但保留它的极端主义:走得远，走得深，走得消极，才能得到现实。

亚历山大·r·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界面效应》一书作者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越糟越好”的观念对被剥夺权力的共产主义者有着明显的吸引力。《恶性速度》(Malign velocity)介入并记录了那些将通过先进的高科技资本主义达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家的未来主义兴奋，并记录了这些加速往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加速更多地把我们带向斯大林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而不是乌托邦。诺伊斯的作品博学、清晰，并带有最黑暗的幽默色彩。

欧文·哈瑟利，《不凡》的作者

在毛衬衫式的新自由主义中，增长率停滞不前，积累依赖于越来越深的剥夺，速度的警笛再次引诱激进的倡导者

理论。《恶性速度》极其清晰地诊断了“加速主义”的时刻，重新审视了之前关于过度退出资本控制的观点——从未来主义到赛博朋克——并揭示了这些理论的政治经济无意识，加速主义者对劳动力的幻想。诺伊斯的书是辩证批判的典范，结合了对加速主义可能性的历史条件的复杂描述，以及对其无力产生足以应对这种危机关头的战略的深刻判断。《恶性速度》既忠实于唯物主义的信条，不给自己讲故事，又编织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强制性作斗争的故事。

阿尔贝托·托斯卡诺，《批判理论》《金匠》读者，《狂热：论思想的用途》作者

恶性速度

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

本杰明·诺伊斯



英国温彻斯特，美国华盛顿

2014年由零书首次出版
零书是约翰亨特出版有限公司、劳雷尔书屋、车站方法、
奥尔斯福德，汉斯，SO24 9JH，UK
office1@jhpbooks. net www.
johnhuntpublishing.com
www.zero-books.net

有关分销商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订购，请访问我们网站上的“订购”部分。

文本版权:本杰明·诺伊斯2013

Isbn: 978 1 78279 300 7

版权所有。除评论文章或评论中的简短引用外，未经作者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本书的任何部分
出版商。

根据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本杰明·诺伊斯作为作者的权利得到了维护。

本书的CIP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得。

设计:Lee Nash

CPI集团(UK)有限公司，Croydon, cr04yy印刷装订

我们在业务的各个领域，从我们的全球作者网络到
生产和全球发行。

内容

致谢
前言

引言:“Accelerate the Process”
    The Bad New
    破坏性元素
    马克思的异端
    《过剩之路》

1. 战争机器
    残酷的速度剃刀
    在月球公园
    机械苦行主义
    无名战士

2. 跃进!飞跃!跃!:共产主义加速主义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agedy
    钢铁侠
    节奏决定一切
    风暴天堂

3. 机器存在
    神秘的机器

火箭人
性工作机器

4. Cyberpunk Phuturism
物质化的刺激与威胁
Techno-Phuturism
Cybergothic Remix
Stasis Today

5. 启示录加速
内在倾向
趋势的偏差
透过黑暗的玻璃

6. 终端加速
在泥里打滚
野蛮还是野蛮?

7. 紧急刹车
在资本主义的尸首之上
懒汉
天使机车
每分钟转数

结语:运动的矛盾
一件理应有趣的事
不可能的劳动
人们害怕合并

笔记

致谢

我与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的持续对话对这本书的形成至关重要。我也从与亚历山大·r·加洛韦、Matteo Pasquinelli、Armen Avanessian、约翰·坎宁安、奥克萨纳·蒂莫菲耶夫、费德里科·路易塞蒂、罗斯·沃尔夫、欧文·哈瑟利、哈里森·弗拉斯、费德里科·坎帕尼亚、萨米·哈提布、丹尼尔·斯波尔丁、丹尼尔·马库斯、史蒂夫·沙维罗、安德鲁·奥斯本、贾勒·曼索尔和安东尼·艾尔斯的讨论中受益。Hilan Bensusan非常慷慨地邀请我在巴西利亚就加速主义发表演讲，并带领我在这座城市四处游览。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也很慷慨地与我的敌人分享了他们支持加速主义的工作，并参与了关于我的论点的辩论。我要感谢尤金·布伦南(Eugene Brennan)对手稿的仔细阅读。Anindya Bhattachryya很有帮助地提供了有用的配乐建议。Dean Kenning提供的封面图片值得特别感谢。所有的错误，照例都是我自己的。首先，我要感谢菲奥娜·普莱斯，感谢她的支持、批评和建议。

第四章取材于*Nyx*《机器》(2012)中发表的“速度机器”，第五章取材于《*沉默:网络后的文化与政治*》(2010)中发表的文章“启示录、趋势、危机”。我要感谢这些期刊的编辑允许我重复使用这篇文章。我要感谢马克·费舍尔邀请我参加2010年9月14日在金匠学院举行的“加速主义”活动，并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人。我还要感谢Matteo Pasquinelli和Armen Avanessian邀请我参加2013年12月14日在柏林举行的加速主义研讨会，以及当天的论文和讨论。

前言

速度是个问题。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受制于不断加速的需求:我们要更多地创新、更多地工作、更多地享受、更多地生产、更多地消费。哈特穆特·罗莎宣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种“极权主义”形式的社会加速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在这里，我想讲另一个更陌生的故事:关于那些认为我们走得不够快的人。他们并没有拒绝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加快的节奏，而是主张我们应该拥抱并加速它。关于速度的作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这样的忠告似乎是一种玩世不恭，建议我们通过积极成为超级资本主义的主体，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价值增长的动力。我感兴趣的是这一叙事的进一步扭转:摆脱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是走得更远，沿着它的逃跑或去属地化的路线走到绝对终点，加速超越生产的极限，从而突破资本本身的极限。

要从一开始就说清楚，我并不认同这个故事。这本书的核心思想起源于90年代初，当时我在写一篇关于乔治·巴塔耶的论文时，第一次遇到了尼克·兰德和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CCRU)的工作。正如我将在第4章中讨论的那样，这项工作是对加速超越资本的愿望最明确的陈述之一。兰德和CCRU用科幻小说和当代理论(尤其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fccru的作品)的语言表述，严格摒弃了任何人文主义的残余。兰德和他在华威大学的同事们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后人类状态，超越了任何形式的主体，除了资本本身的谵妄过程。他们声称，资本的去疆域化过程——流动和流动的过程——的复制和强化，将导致资本无法实现的控制论进攻

更长时间的控制。读到这种全面发展的加速主义，再加上对新右翼及其“解散”国家的目标的讨论，当时我创造了“德勒兹式撒切尔主义”这个词。

正是这些思想在00年代的复兴，包括兰德的论文的再版[2]，使我回到了这些问题上，并通过使用“加速主义”一词提供了更精确的批判性描述。[3]原来这个词出现在罗杰·泽拉兹尼的科幻小说《光之王》(*Lord of Light*, 1967)中，我也读过这本书。无意识，一如既往，以神秘的方式起作用。在我最初的批判性分析之后，出现了一股新的当代加速主义浪潮，正是这一事实，尤其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促使我写了这本书。

我的目的不是对加速主义进行详尽的描述，而是选择它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策略出现的某些时刻。在引言部分，我首先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初至中期一小群法国理论家对加速主义的理论化。我认为，这个短暂的理论过剩时刻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尝试，它试图阐明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吸收并恢复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它将提供一把钥匙，打开我随后追踪的不同加速的历史时刻。从意大利未来主义开始，我将从俄国革命后的共产主义加速主义，到与机器融合的幻想，到90年代和00年代的赛博朋克摄影主义，2008年后危机时刻的末日加速主义，以及消极形式的终端加速主义。在最后一章，我回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通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相遇，重新上演围绕加速主义的辩论。这个场景浓缩了加速主义的问题和新事物的生产。在我的结论中，我想提出一种摆脱僵局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简单地用减速的愿望来对抗加速。

由于这是一部出于战胜加速主义的困难感而写的作品，我不希望在这里写下它的墓志铭。我不能否认加速主义的吸引力，尤其是作为一种美学。我想做的是为加速主义提出一些理由

加速主义所产生的*吸引力*，尤其是当它看起来是一种反直觉的失败主义策略时。我认为，这种吸引力依赖于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作为极端和反常享受的场所的方式。加速主义者使用“欢爽”*(jouissance)*这个概念——这个法语词用来指一种如此强烈的享受，它与痛苦难以区分，是一种受虐狂——就是这种现象的标志。虽然加速主义想要加速超越劳动，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把劳动的痛苦和快乐作为一种经验来关注。如果我们被迫劳动，或者被投送到另一个失业的地狱，那么加速主义试图欢迎并让我们沉浸在这种不人道的经历中。虽然这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失败了，但它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资本主义下不可能的劳动经历。我们经常被告知劳动，或者至少是“传统劳动”，已经结束了;正是加速主义的过度表现表明，劳动仍然是一个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通过劳动来加速的加速主义解决方案是错误的，这一点将变得很明显。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本身。

Benjamin Noys
Bognor Regis, 2014

导言:《加速进程》

> 不要从好的旧事物开始，而要从不好的新事物开始。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坏新》

我想从加速穿越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第一次被明确理论化的那一刻开始。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法国，有三本书，每一本书都适当地试图超越和超越另一本书，试图赋予这一战略最具挑衅性的形式。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关于加速的辩论，并探讨了加速战略与资本主义的溶媒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本是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1972)，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将欲望的力量局限在俄狄浦斯网格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如副标题所示，这本书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精神分裂症重新评价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疾病，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崩溃是突破资本主义限制的失败尝试。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释放了其他社会形式试图约束和编码的去疆域化和解码的力量。然而，这种释放总是暂时的，它将欲望拖回到家庭和俄狄浦斯矩阵中，重新编码它已经解码的东西。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策略被提出了一系列反问句:

> 但哪条是革命道路?有一条吗?退出世界市场，就像萨米尔·阿明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做的那样，在法西斯“经济解决方案”的奇怪复兴中?抑或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还要走得更远，也就是在市场的运动中，在解码和去疆域化的运动中?因为，从一种具有高度精神分裂特征的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来看，或许流动的去地域化还不够，解码还不够。不是退出这个过程，而是走得更远，“加速这个过程”，正如尼采所说:在这个问题上，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很明显，如果我们遵循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关于各国与资本主义脱钩的建议，我们将面临被指责为早期法西斯主义的风险。相反，我们必须遵循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尼采式偏好来“加速这一过程”。要打破资本的限制，需要进一步的去属地化和解码，超越俄狄浦斯家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约束。这导致了“精神分裂症”的新形象，他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被锁在精神病院的“软布”，而是一种接力，代表着所有无法控制的液体和加速流动的去领土化;在尼采的精神错乱中，他宣称“我是历史的所有名字”。[2]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部挑衅性作品的一个极端时刻，它还为分析资本的不透明和惯性形式提供了其他途径。也就是说，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趋势，我们达到绝对的去属地化的建议是足够明确的。当然，这种加速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引发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把资本比喻为“巫师的学徒”，释放出它无法控制的力量德勒兹和瓜塔里就属于这个谱系,

将马克思推向了摧毁所有价值观，包括作为资本主义自身核心功能的“价值”的边缘过剩。这是一种将生产作为欲望生产的形而上学，它可以追溯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

作为回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做得还不够。他们对欲望的颂扬仍然假定它形成了某种外部力量，资本主义寄生于这种外部力量，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替代。相反，利奥塔的《*利比多尔经济*》(1974)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利比多尔经济:资本主义本身的利比多尔经济。我们找不到一种“无辜的”精神分裂的欲望，而只有资本主义的欲望可以与之合作。在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加速主义者的声明中，利奥塔并没有回避他的立场的含义:

> 英国失业者不必成为工人才能生存，他们——紧紧抓住我，唾弃我——享受*着*歇斯底里的、受虐的、无论在矿井里、铸造厂里、工厂里、地狱里挣扎的疲惫，他们享受着，享受着他们的有机身体被疯狂地破坏，这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享受着他们个人同一性的瓦解，享受着农民传统为他们建构的同一性的瓦解，享受着家庭和村庄的解体，享受着郊区和早晚酒吧里新的可怕的*匿名*

利奥塔否认那种左派政治，这种政治坚持认为工人在与他们的社区、他们的身体和有机体的分离中遭受异化。相反，利奥塔建议工人在对他们身体的“疯狂破坏”中体验*爽爽*，一种受虐的快感。不出所料，利奥塔的言论使他失去了左派的大部分朋友，甚至他后来也把*利比多尔经济*称为他的“邪恶之书”。[5]

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将马克思的“生产的隐蔽居所”作为欲望的力量进行改造相比，利奥塔停留在表面上。他是一种关于信用和投机的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价值是从贸易和交换关系的转变中产生的，这种转变超越了实际生产的约束。这解释了利奥塔对重商主义学说的奇怪推广——正如17世纪和18世纪在法国所阐述的那样，这是一种旨在控制对外贸易以确保贸易积极平衡的经济学说。在利奥塔的笔下，这一学说被改造成了一种掠夺的零和游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性欲，即对货币的痴迷。

让·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批评利奥塔、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欲望的怀旧依恋和作为对立力量的力比多。只有“死亡，而且只有死亡”体现了一种可逆的功能，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强加的杂食性编码鲍德里亚在死亡中发现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这种挑战通过回到前资本主义经济对礼物的挑战而消灭了价值，现在通过“神奇的”逆转与超越资本的力量联系在一起。

然而，鲍德里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这些持不同意见的流派背后的生产的形而上学进行争论，与加速主义保持距离。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3)中，他已经批判了“一种毫无节制的生产力浪漫主义”。对鲍德里亚来说，加速的不是某种力的流动，而是一种灾难性的、熵的负性，它涌入系统，导致系统内爆——结果是一种终极加速主义。

这是一种加速主义的通货膨胀形而上学——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它掏空了货币的功能，而且是一种优越的象征性交换，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暗示自己，加速了这一过程。虽然鲍德里亚不颂扬生产或性欲的流通，但他将货币的通货膨胀泡沫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意义和价值撤离的标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奥塔在回应鲍德里亚论点的早期版本时，已经暗示:“*在资本主义交换中,与所谓的‘象征性’交换*中，*有着同样多的力比多强度*。”嘲笑鲍德里亚的人类学转向“原始”的利奥塔说，没有“好的嬉皮士”来实践符号交换，只有“*资本的欲望*”。利奥塔的意思是，即使死亡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出路，这是唯一的游戏。结果是，鲍德里亚对另一种交换原则的信仰被误导了，因为资本主义可以吸收和寄生于任何象征性的交换。

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螺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真正接受自己完全沉浸在资本之中，并试图抓住一个逃避点:欲望、性欲、死亡。每个人也都体现了资本的一个特定时刻:生产、信贷和通货膨胀。其结果是，每一种都强化了一种激进的内在性政治，一种浸没在资本中的政治，以至于任何区分激进战略与资本战略的方法似乎都完全消失了。

破坏性因素

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勋爵*》(1900)中，角色斯坦给出了一些(对康拉德来说)典型的神秘建议:

> 一个出生的人就像一个掉入大海的人一样，掉进了一个梦。如果他试图像没有经验的人那样爬到空中，他就会淹死——这是*怎么回事*?……不!我告诉你!方法就是屈服于破坏性的因素，用你的双手和双脚在水里的努力，让深深的、深深的大海把你保持在水面上。所以，如果你问我——怎样才能活下去?

他的回答是:“沉浸在破坏性的元素中。这些理论加速论者把斯坦的建议牢记在心。我们陷入了资本主义，而不是试图爬出来，我们不得不屈服，与资本主义的潮流一起游泳。

这种反应可以看作是法国革命事件所激发的希望破灭的结果，这些希望浓缩在“68年5月”这个能指中。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写作的时候，这种失败并不明显，许多其他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在努力维持和激进68年爆发的斗争。这些能量会在反动的80年代消退，然后德勒兹和瓜塔里、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的加速主义立场会变得有先见之明。他们的立场记录了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及其传播其统治的能力，通常是通过恢复斗争的形式。资本的总体效应似乎能够推动革命的进步，使得在资本之外寻找革命主体变得多余。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新的革命主体性——“精神分裂”，以及他们后来称之为“次要的”变成——保持信心，而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则更坚定地拥抱祛幻。

这些加速主义的表述绝不仅仅是时代的标志，而是作为对即将到来的糟糕日子的预言而获得了共鸣。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极夜”中得到了更多的印证。那时，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与日俱增，冷战的冰封，以及新自由主义反攻的开始，提供了一种封闭(如果不是终结的话)视野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作为一名青少年，生活在一种周围充满恐惧的氛围中，对我来说，这在观看BBC核攻击后的创伤电影《*线索*》(1984)和特洛伊·肯尼迪·马丁的《*黑暗边缘*》(1985)的偏执中得到了总结。最近有消息透露，白厅的规划者制定了一个核战争游戏场景，其代号“Winter-Cimex 83”恰如其分，令人心寒。我后来读了鲍德里亚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发表在《半文本(e)外国代理人》系列的小黑本上，立即产生了对这种情绪的认识。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将更真实地反映资本主义的惯性本质，对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加速主义形象提出质疑。

理论加速主义之所以抓住了这种情绪，正是因为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资本主义长期低迷之初形成的。这些赞美诗

资本主义的过度权力是在危机面前表达出来的——“石油危机”，金本位的放弃，生产力的危机，以及合法性的政治危机(水门事件等)。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利用计算机模型论证了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其自身“成功”的物质基础。因此，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个加速主义的理论时刻似乎与资本主义进入停滞、减速和衰退时期的潮流背道而驰。然而，另一方面，它似乎预示着控制论和金融力量的突然“加速”，这将构成新自由主义的基础，1979年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当选和1980年美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当选标志着这一点。事实上，特别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去领土化”将在用来描述新自由主义资本中找到一个丰富的未来，这是一个迹象。

这些模型提前制定了90年代的常识，即“别无选择”(TINA)。如果我们在这些时刻跟随加速主义的职业生涯，我们会看到它与资本主义地平线的关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它提供了一种理解资本主义持续渗透的方式——横向地，在世界各地，纵向地，深入到生活的毛孔——同时，庆祝这是即将到来的超越和胜利的标志。我们对内在性的沉浸需要加速这一过程，以达到作为门槛的超越时刻。这样，内在性与(延期的)超越配对，失败变成了胜利。与此同时，失败被这些理论加速主义形式以狂喜的痛苦、欢爽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我们不断加深的沉浸中体验。

马克思的异端

这一理论时刻涉及马克思和尼采的奇怪融合。它借鉴了尼采对“打破”的启示

“世界一分为二”，以及推动完成虚无主义的需要，价值观的崩溃，折磨着我们的文化。尼采并没有谴责价值观的崩溃，而是把这些废墟看作是超越西方文化界限的可能性。

这将与马克思的论点相融合，即历史是由坏的一面推进的，它欢迎资本主义在溶解旧世界方面的溶解性作用其结果是一个尼采式的马克思，一个关于力量和毁灭的马克思。1859年，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歌颂生产力:

> 任何社会制度，在足以满足它的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是决不会消灭的;新的优越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还没有成熟以前，是决不会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有一个目的论——通过不同生产方式的线性通道，共产主义在其中解决了历史之谜，并承诺了一种不受资本主义对抗的更优越的生产方式。

也许“尼采式马克思”最具争议的时刻是他写的关于印度的一系列文章。在他1853年的文章《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强调了英国殖民主义将如何破坏印度的“停滞”，并似乎欢迎殖民主义的暴力，工业和铁路的到来，作为旧方式的必要粉碎。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显得模棱两可。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步”总是“把个人和民族拖进血腥和肮脏之中”，而英国的殖民主义除了破坏之外几乎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对马克思来说，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这些“发展”才能被用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虽然有一个目的论的马克思的发展和生产，马克思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导致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道

资本主义危机提出了“斗争阶级的共同毁灭”和“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之间的选择。马克思欢迎工人为减少工作日和反对工厂专制而进行的斗争;他没有争辩说，如果工厂条件变得更糟，这样工人就会被迫起义，那就更好了。历史前进的一面是不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庆祝“不好的一面”，而是要认识到这是我们斗争的基础，必须否定它，以构建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秩序。

理论加速论者试图通过只强调创造性破坏的暴力时刻来打破这种救赎的辩证法。取代了通过斗争产生的正义社会，加速成为了幻灭救赎的载体。这使他们成为马克思的异端。虽然经典的理论加速论者经常采用尼采式的偶然性和偶然性的主题，但就加速而言，他们倾向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最目的论形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速主义将偶然性投射到资本主义身上，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反目的论的，或“头型的”(无头的)社会形式。在做出这一预测时，加速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关于自我产生生产的基本幻想视为事实。他们是资本拜物教者的典型例子。

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关于自我产生的生产的幻想在马克思身上是存在的。我认为，对这种幻想的批判是一种根本的必要性。虽然我们当然只能在存在的基础上开始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但这并不需要接受所有存在的东西，也不需要接受被赋予的存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在不复制“坏新”的情况下，从“坏新”中创造变化?当然，加速论者的答案是通过更多的复制，因为复制会导致资本的“内爆”。然而，复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把我们留在资本之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

过量之路

人们可能很容易将理论加速主义视为那些把理论走得太远的人的一种弊病，将其剥离为抽象的猜测。事实上，正是加速主义这一点走得太远了，以及这种沉浸和过度所产生的狂欢和享受。它们推进了抽象和思辨的领域，而这个领域，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显然是我们存在的空间。我怀疑这样一条“过度之路”，用威廉·布莱克的话来说，是否会通向“智慧之宫”。然而，它确实引导我们思考这种过度和抽象可能记录的内容。如果加速主义不是革命性的道路，那么它可能是以夸张和夸张的形式记录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速主义特别记录的是两条相互矛盾的趋势线:第一条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减速，就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言，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债务转换。第二种是金融化的加速，这是由新的计算和控制论技术驱动的，这些技术本身创造了一种活力的形象。当然，这种减速和加速的“矛盾”说明了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加速来重启积累过程的双重动态。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将这一矛盾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在这种双重动态中，加速主义找到了它的理论化，用对新的加速的承诺来回答减速，这种加速是由对新生产力的信念驱动的，新生产力上线了，破坏了往往成为资本主义默认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在资本主义中，我们被视为自由的代理人，尽管总是在市场设定的条件下自由选择。加速论者通过拥抱去人性化来拒绝这种“人道主义”。他们完全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非人性化方面的论点，他们也严肃地对待那些试图这样做的市场理论家

把我们非人化，变成“纯粹的”市场机器。这就解释了加速主义的不稳定性，它正处于这条断层线上。
它也说明了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既是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断被机器和失业所排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运动的矛盾”，它“竭力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另一方面又把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一矛盾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变得越来越突出。至少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劳动力的位置已经从制造业转移到所谓的服务经济(尽管这种转移不应该被夸大)。它也在地理上和形式上被取代了——分散在它曾经拥有或似乎拥有的集中形式之外。与此同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更努力了。技术本应从劳动力中带来的解脱，只是让更少的劳动力做更多的工作。不再像马克思时代那样，我们都被拴在工厂机器上，但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以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形式随身携带着我们的锁链。

我的建议是，加速主义试图通过将劳动重新整合到机器中，将劳动问题作为这种不可能的、受虐的体验重新参与*进来*。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看到这种整合的幻想，即“人机”(注意性别化)，它可能会立即拯救并超越劳动身体。这将以各种形式出现，既有彻底的反乌托邦，也有彻底的乌托邦。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症状*。如果我们批判地看待加速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衡量劳动力的突变，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和机器内部整合的抵抗——包括破坏、罢工和更神秘的被动抵抗形式。理论加速主义对我们沉浸在资本主义中的压力，将被证明是解开我将在本书中追踪的各种文化和历史时刻的核心。加速主义的极端化使它成为最有用的诊断工具。它也将使我们能够尝试和打破加速主义的吸引力。

1
战争机器

参观Gabriele D’annunzio位于Gardone Riviera湖畔的别墅和花园是为了体验速度作为现代性基本标志的纪念。这是通过现代性的另一个标志——机械化战争——来矢量化的速度。在他的诗歌之外，别墅和花园是达南齐奥真正预示着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品。庄园的名字*Vittoriale degli italiani*(意为意大利胜利圣地)，是对达南齐奥的原始未来主义和原始法西斯主义愿景的“人机”的卓越而令人不安的证明。它包含了体现这种加速和战争美学的所有“速度机器”。其中有丹农齐奥担任船长的*Motoscafo Armato Silurante* MAS-96反潜摩托艇，他把这个名字变成了拉丁格言*Memento audere semper(*“记住永远要勇敢”)。1918年8月9日，作为“La Serenissima”第87战斗机中队的中队长，他驾驶SVA-5飞机在“il *Volo su维也纳*”(“飞越维也纳”)上投放宣传传单和炸弹。最引人注目的机器是由意大利政府捐赠的“普利亚”号军舰，现在已嵌入山坡。

这艘从山坡上突飞猛进的阳具船，似乎恰恰体现了男性化和原始法西斯主义通过技术和加速对自然的掌控。达农齐奥写道，战舰的船头是“一个巨大的阳具延伸”。它体现了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在描述意大利未来学家f·t·马里内蒂(F.T. Marinetti)时所说的“*非人类型*”:“一个动物的身体消失在金属身体的超能力中，这种超能力能够通过其动态表现消灭时间和空间。”[2]达南齐奥的个人座右铭“*per non dormire*”(“为了不睡觉”)提前完美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将人类的意志导向一种机械化的加速，取代了任何有机的需要。它也可以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座右铭，正如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所指出的那样，它向睡眠宣战，睡眠是人类为数不多的剩余的非生产性活动之一
然而，这艘船不知何故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种奇怪的融合中，当这艘船从山坡上冲进湖中时，它加速了自然的力量。站在甲板上，就是体验下水那凝固的瞬间令人眩晕的倾覆。其他各种速度和破坏的机器和装置被放置在一个房子和花园中，这一事实提供了一种不协调的体验，它疏远了自然和技术。这种技术田园表现了将技术的力量注入自然，并通过与自然的融合赋予技术生命的愿望。至关重要的是技术速度与“动物”或自然身体的动态和重要意志之间的联系。

在本章中，我想考虑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对速度的庆祝，以及他们试图利用速度和加速度的力量作为加速主义的ur形式。未来主义者对战争的崇拜，对女性的厌恶，以及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盟，使他们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有毒前卫。我的目的不是要救赎那些无可救药的人，也不是要利用他们提前给加速主义定罪。相反，我想探讨未来主义者如何试图把握和整合那些表现为*破坏力的生产力*。这涉及到奇怪的整合和置换，因为未来主义者试图融合和注入充满生命力的机械体，并加速这些新的融合力量走向毁灭和重生的门槛。

《速度的残酷剃刀》(Cruel Razors of Velocity

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完全信奉达南齐奥预言的对速度的崇拜。马里内蒂所著的《未来主义的创立与宣言》(1909)第四点宣称:

> 我们坚信，一种新的美形式丰富了世界之美:速度之美。一辆引擎盖上的大管子闪闪发光的赛车，*就像*一条喷着爆炸性气体的蛇，一辆轰鸣的汽车，似乎骑在葡萄弹上——这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还要美丽

在第八点中，未来主义者继续宣称“我们已经创造了永恒而无所不在的速度”，而在第九点中，他们明确了军事速度(以及厌女症)的重要性:“我们打算颂扬战争——世界上唯一的卫生——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姿态、值得为之献身的美好理念，以及对女性的蔑视。[5]
对女性的蔑视表明了通常的装甲修辞，即用坚硬的、生殖器化的、机械化的男性身体来对抗女性化的身体:柔软的、液体的、有机的。作为回应，未来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瓦伦丁·德·圣波因特(Valentine De Saint-Point)写了《未来主义女性宣言》(1912)，认为女性与男性是平等的——就值得同样的蔑视而言是平等的在这个有趣的反人道主义的开场白之后，争论又回到了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更多的男子气概，都应该把“野蛮人”作为他们的榜样。解决厌女症的方法是加入残暴的平等，确认机器的阳具硬度作为两性的目的地。
以类似的方式，马里内蒂的厌女症也指向了一种普遍的反人道主义——对速度的崇拜打破了人类的极限。马里内蒂宣称:“那些虚弱和生病的人将被无情的文明车轮碾碎，粉碎，粉碎。”外省长满青苔的街道上的绿胡子将被速度的残酷剃刀刮得干干净净。唯一的幸存者是由“残酷的速度剃刀”进行的选择性手术，它将提供“干净”的速度，将人体转变为新的个人战争机器。

未来主义者试图实现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所说的“对机器的虚拟征用，对机器的顺势疗法式征用”

异化的动力。这种通过战争手段对活力的虚拟合作一直贯穿到未来主义的最后。1941年，马里内蒂与未来主义诗人皮诺·马桑塔和叛逆的数学家马塞洛·彪马共同撰写了《定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未来主义数学》宣言。彪马是量子力学和传染病传播模式的学生。这种新的“抗静电反逻辑反哲学数学”提供了非线性的加速模式。未来主义者对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拥抱意味着他们可以想象出一种“诗意的几何”，在这种几何中，尼罗河可以被重新导向，回到自己身上，这表明未来主义者的加速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目的论的向前运动。

然而，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治数学，它利用了未来主义者对其政敌的破坏性力量。宣言庆祝1919年4月15日的战斗，当时未来主义者和退伍军人袭击了米兰Mercanti大街上的共产主义集会，然后烧毁了社会党报纸《*Avanti*》的总部!:

> 计算1919年4月15日在米兰取得的革命胜利(Via dei Mercanti之战)，通过50名未来主义诗人，100名阿尔蒂蒂，50名早期法西斯游击队员和300名理工学院学生+政治天才墨索里尼+马里内蒂大胆的空中艺术想象力+费鲁乔·维奇为了打败10万名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被击溃了，因为他们充满了和平主义，因此被手枪吓坏了，爱国的勇气乘以了一百倍

马里内蒂和彪马的计算似乎是客观的，但它把战斗中的成功建立在“伟人”的定性价值上。分遣队允许将领导者注入“客观”的机械部队阵中。

根据杰弗里·t·施纳普(Jeffrey T. Schnapp)的说法，这种未来主义数学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统计数据相结合

试图用一种“统计崇高”来超载累加的线性数学回路。在它们的机械整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对动态的虚拟合作的尝试，也试图占据和超载未来主义所赞美的技术力量。这表明未来主义不仅仅是对技术和战争的庆祝，而是一种重新设计或努力将加速推向新的形式。显然，意大利未来主义的主要形式妥协或庆祝法西斯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保持在法西斯现代化的复杂和边缘位置。未来主义者所强调的是，加速主义总是一种干预或力量的选择，特别是在新的“机械”配置中整合劳动力的需要。

在月球公园

在他著名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的后记中，沃尔特·本雅明谴责了未来主义者对战争的审美化，在战争中，“我们把自己的毁灭作为第一层次的审美乐趣来体验。”[12]虽然这已经成为未来主义者公认的诊断，本雅明继续补充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理解他们对战争的审美化是阻碍生产力“自然”使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接受未来主义者的诊断。未来主义者将生产力的破坏性转向审美化，因为他们无法真正把握重新部署这些力量的可能性。

本雅明的简短建议可以追溯到他的短篇作品《去天文馆》，包含在他的书《*单行道*》(1928)中。在书中，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与宇宙力量前所未有的新融合的尝试”。虽然科学似乎已经使星辰幻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逃避这些宇宙力量，它们被重新转化为技术力量。战争呈现出释放和令人陶醉的破坏力量的模棱两可的场所：

> 大量的人类、气体、电力被扔进开阔的乡村，高频电流穿过大地，新的星座在天空中升起，航空空间和海洋深处轰鸣着螺旋桨，到处都在大地母亲身上挖着祭祀的竖井。(103-4)

在本雅明的准神秘主义解读中，这是通过“技术精神”实现的“对宇宙的巨大追求”(104)。由此产生的“大屠杀”是由于这些宇宙力量受制于利润，即资本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应该被抛弃。本雅明认为，我们应该重新配置掌握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人类不再应该主宰自然，而是人类需要掌握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些宇宙力量的陶醉已经误入歧途，这就引出了速度的问题:

> 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对速度的体验，人类正凭借这种体验，准备踏上不可估量的时间内部之旅，在那里遇到病人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节奏，就像他们早先在高山或南海的海岸上所做的那样。“月球公园”是疗养院的先兆。(104)

“月球公园”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游乐园的早期名称，第一个使用这个名字的公园是1907年在纽约的康尼岛。本雅明的建议是，这些公园——包括过山车和其他游乐设施——形成一种顺势疗法或治疗性陶醉或加速，这将使我们能够治愈技术的肺结核病。陶醉是对抗陶醉的一种游戏。

结果是一种拥抱，将技术作为第二天性，拧成一个新的配置:

> 在上次战争的毁灭之夜，人类的身体被一种类似癫痫病人的幸福的感觉所震撼。随之而来的反抗是人类第一次试图控制这个新躯体。无产阶级的力量是衡量它的康复程度的标准。如果它不被这种力量的纪律牢牢地抓住，任何和平主义的辩论都救不了它。有生命的实体只有在繁殖的狂喜中才能战胜毁灭的*狂乱*。(104)

在本雅明奇怪的宇宙幻象中，他后来将对其进行问题化或消除(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的)，湮灭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新的陶醉，一种我们必须掌握的新的集体和个人身体——一种“冲动”[劳什]。

尽管未来主义者和本雅明在掌握加速技术这一模棱两可的基础上存在着极端的政治分歧，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趋同。虽然本雅明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反抗，而未来主义者则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新“纪律”，但他们都提出了一种集体掌握加速的乌托邦可能性。他们关注的是令人陶醉和狂喜的力量的整合和加速。他们暗示，没有回头路可走。需要更多探索的是这些力量的形式和性质。

机械禁欲主义

未来主义者运用一种加速美学，这种美学不仅基于战争，也基于工业革命。他们想要挖掘的能量，其实定位在工业与战争的交汇处。然而，这种尝试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英国涡旋主义者温德姆·刘易斯在自传中描述了他与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的邂逅。当马里内蒂试图让刘易斯成为未来主义者时，刘易斯以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和尖刻的方式回答说:

> “还不错，”我说，“也有它的道理。但是你们德国人太强调机器了。你总是对这些传送带喋喋不休，你总是对内燃发火。我们在英国已经有机器好多年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14]

撇开种族歧视不谈，刘易斯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对机器的另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关于现代性的冲击，而是机器与日常生活的融合。

马里内蒂对刘易斯的回答，准确地说，是以加速为前提的:“你从来没有理解过你的机器!你永远不知道以*每分钟*一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意义。你曾经以每分钟一公里的速度旅行过吗?刘易斯的回答是:“从来没有。我使劲摇了摇头。“从来没有。我讨厌任何走得太快的东西。如果它走得太快，它就不在那里。刘易斯像他经常说的那样，提出了清晰划分的需要，这与速度造成的模糊是相反的。然而，他援引英国的机器经验，表明了速度、机器和劳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战争的机械化。

利奥塔将先锋派的经验与工人的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奥塔后来在反思他自己对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欢爽*体验的臭名昭著的召唤时说:“他的目的是要传达，在最艰苦的工人阶级条件下，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很容易与诗人、画家、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最大胆的修补匠和篡改者的冒险相媲美，甚至可能超过。工人们被强加的要求是建立一种新的身体、一种新的感官和一种新的情感，这种要求与先锋派在创造“人-机器”方面的实验相匹配，甚至超过了这些实验。

利奥塔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追溯了劳动力和机器的整合能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卫的特征是晚到的。十九世纪的工人

世纪已经超越了身体的感官限制，并且在利奥塔有争议的补充中，享受了这种体验。利奥塔的重音是双重的。第一，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变成工人的经历当作是被动受苦的简单受害者的经历而不予理会。对于这些增强和扩展的身体的新可能性，有一种*积极*的参与。他的第二点是，这种参与创造了一种新的体验模式，甚至是伦理模式。早在先锋派之前，工人们就实践了一种“机械禁欲主义”，他们坚持在一个似乎不可能做到的地方。

其结果是诞生了“一种由奇怪的小蒙太奇组成的新情感”。(15)以好斗的风格，利奥塔对那些不接受工人的经验是狂喜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欢爽*”。法国人认为它指的是一顿喝了博若莱酒的大餐后的狂喜。(18)与刘易斯一样，利奥塔拒绝了这种对受虐快乐的净化，指出了工人与机器接触的长期形式。这在未来主义的形式中是隐含的，它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调情。加速主义将贯穿本书，它的难点在于，它试图通过将劳动整合到机器中来解决劳动的这种痛苦。如果说，尽管战争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它可以被翻转为英雄主义，那么劳动的抵抗力就会更强。

利奥塔的机械崇高，后来他把大屠杀作为他的模型，将其转化为悲剧的记录，在这一点上，表明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过度。这种决裂将工人置于中心，条件是他们消失在一种力量的美学中。这样的模型与未来主义者的“统计崇高”相呼应，这是他们试图描绘出一种超越结构和控制力量的加速通道。对于利奥塔来说，这个崇高的时刻标志着他离开了左派，而未来主义者在政治上更加可疑。似乎，想要超越左派“虔诚”的欲望导致了对崇高的拥抱，而这种拥抱又将这种修辞恢复到其保守的根源。过度不一定是好事。

无名大兵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勾勒出了一整个速度庆祝者的谱系:“无论是辍学者、垮掉的一代、汽车司机、农民工、游客、奥运会冠军还是旅行社，军事工业民主国家都把每一个社会类别毫无区别地变成了*速度等级的无名士兵*。”未来主义者是这种新秩序的先驱。他们自己的时代短暂，消失在一场战争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复兴之前，他们的几位主要成员丧生，这是他们自己渴望加速进入未来的一个迹象。他们自己对前卫时代的生活体验是建立在速度和过时之上的。马里内蒂在《建国宣言》中宣布:“其他更年轻、更强壮的人会把我们扔进废纸篓，就像无用的手稿一样。”-我们希望它发生![18]

这种过时的逻辑，不仅诉说着先锋派的疯狂涌现和消亡，每一种都试图加速超越另一种，也诉说着劳动的经验。工厂工人或其他劳动者疲惫不堪的身体，要么退休，要么被抛弃，由新的“更年轻、更强壮”的身体取而代之。在某种程度上，未来主义瞄准了这种替换的逻辑——首先，它试图用一种新的硬化的未来主义身体来取代柔软而颓废的资产阶级身体，然后随着身体的磨损而丢弃它。这种有限性模型暗示，加速和技术并没有在一种将我们送到劳动极限之外的线性目的论中顺利展开。相反，我们似乎停留在这个极限上，作为一个斗争和矛盾的点。

我讨论未来主义作为加速主义的熔炉的目的就是探索这个极限。一方面，未来主义似乎对资本主义技术的加速模仿和道歉，如果不想以法西斯形式重新排序的话。另一方面，未来主义的非线性和破坏性时刻有可能使这一意识形态计划崩溃，并使加速主义受到质疑。我认为这种质疑不够深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今天加速的重新出现，表明了an的模棱两可的吸引力

先锋派承诺一种干预，可以抓住，或试图抓住，技术力量。我们现在的时刻，正如我们将继续看到的，缺乏这种希望，并试图从过去恢复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情地指向未来的加速主义，结果却成了怀旧主义。这种讽刺还会重演。我认为，对加速主义的怀旧之情表明，在处理劳动问题和脱离决定加速的现有飞行路线方面存在困难。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复制的报复一直困扰着加速主义者对崇高的追求。未来主义者并没有预测他们所期望的技术与人融合的重新装备的未来，而是回归到价值形式内的位移和重新工作的残酷历史。在试图逃避到某种统计的崇高时，他们又跌入了价值的崇高。

2

跃进!跃!跃!:共产主义加速主义

> 革命使时间缩短了一半。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4)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报告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古巴苏联贸易部工作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在当时的总统奥斯瓦尔多Dorticós召集的一次经济会议上，对一个经济部门的特定计划进行了讨论。一位顾问认为，其目标必须是以最小的努力和费用产生最大的产出。Dorticós坚决不同意:“这不是革命的方式，”他坚持说，“相反，我们的目标是用最大的力量(fuerzas)实现最大的产出。”[1]我想探索这种态度，作为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加速主义”的关键。我们已经看到，加速主义通常是一种试图驾驭资本无限自我扩张价值的策略。共产主义的加速主义，被克里斯·阿瑟称为“不复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实践的那种，做了一些相当不同的事情。它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更优越的生产方式——一种既能吸取资本主义的“精华”，又能对其进行重组，以超越利润驱动的制度的限制的生产方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诉诸于这种“骑兵冲锋法”，正是为了突破未来，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让人类劳动负责。

我的重点将是俄国革命，以及由于这一事件而释放出来的乌托邦梦想。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革命释放了对时间和工人位置的新想象。苏珊·巴克-莫尔斯评论道:“机器文化，

苏联风格，其起源是匮乏的表达，因此，即使它的残暴也可以被视为具有乌托邦的性质。[3]特别是，正如后来古巴革命的故事所说明的那样，人类劳动的因素被视为通过将生产置于理性控制之下而加速超越资本的关键。
当然，这是一个失败、暴力、残暴的故事。这些发展和控制生产的企图所造成的极端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农民来说。虽然我们绝不希望淡化或宽恕这一点，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资本从头到脚，从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污垢”。[4]资本的控制和再生产过程往往更加“间接”，这一事实掩盖了人们对这种历史暴力的看法，正如胜利者书写历史一样。正是打断和发展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的愿望，推动了共产主义的实验。

马克思探索了劳动力是唯一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商品，是唯一能够因其劳动力或潜力而超越自身极限的商品。资本作为“运动的矛盾”，一方面依靠劳动力来产生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倾向于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力。生产力是已经凝固并加密为机器和其他装置的“死劳动”。由于缺乏这些先进的技术，再加上内战的破坏，俄罗斯的新共产主义政权被迫依靠劳动力。正是这种对活劳动的使用，似乎能够恢复对资本专制的控制和人类意志。把活劳动放在首位，可能是迈向新的生产制度的第一步。

《最高程度的悲剧》

“战时共产主义”是对俄国1918-1921年这段时期的追溯性称呼。面对内战、国际干涉和生产崩溃，这是新生苏维埃社会的“零度”。托洛茨基写道:“俄罗斯——被洗劫、被削弱、被耗尽、分崩离析”，而这一切都是“在

最高程度的悲剧。”[5]面对无产阶级因内战而被削弱，而革命正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作为回应，托洛茨基在他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中呼吁劳工军事化，这是臭名昭著的。这种对“异乎寻常的劳动热情浪潮”的呼吁，通常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绝望所引起的一种幻觉。通常的观点是，布尔什维克把战时共产主义的灾难性条件误认为是立即产生共产主义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加速从零开始，从激进的破坏中出现。

这一观点受到Lars T. Lih的质疑，他认为托洛茨基对“劳动义务”和“震撼工作”的呼吁并不是由生产幻想驱动的，而是对紧急情况的反应——托洛茨基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混乱、资源枯竭的封锁堡垒的政权”。也就是说，一些布尔什维克确实将战时共产主义视为一个从零开始彻底重组资本主义的场所。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实验和建议，并持续到新经济政策(NEP)时期(1921-1928)资本主义的部分复辟。战时共产主义，在此期间，货币停止运作，生产陷入停顿，似乎需要新的乌托邦来拯救革命NEP时期，虽然恢复了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但也是一个相对思想自由和实验的时期。因此，虽然我不想强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被疯狂的“狂喜”所驱动的通常形象，但我确实想追溯一些辩论和建议，这些辩论和建议试图重新启动这一时期遭受破坏的生产，旨在实现共产主义梦想，提供一种优于资本的生产方式。

这场辩论的中心点之一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在“科学管理”方面的工作，他引入了将任务分解成离散单元的技术，以提高效率并提取更多的劳动力。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列宁将泰勒主义描述为“人类被魔鬼奴役的奴隶”

机器”。然而，列宁在1918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组织下采用泰勒主义可能是一种进步的措施。这个“无产阶级泰勒主义”的梦想旨在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减少劳动，这样苏联工人就有时间参与新政权的生活。困难在于，管理部门需要确保这种“科学工作”本身在苏维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无产阶级泰勒主义”的梦想仍然是一个梦想，但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梦想。

破坏的现实与接受新的资本主义技术作为创造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的愿望之间的滞后产生了矛盾。随着欧洲革命，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被粉碎或未能实现，这种矛盾只会变得更加尖锐。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认为，苏联先锋派牺牲了先锋派实验的时间，即“中断、疏远、逮捕的活生生的暂时性”，11，以换取先锋队的进步时间来解决这一矛盾。虽然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差异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新生产形式的梦想中，实验的从属地位最终将在斯大林主义下完成。我想提出一些稍微不同的观点，而且相当令人不安。先锋派某些元素的时代是一个*加速的时代*，它发现自己与先锋派对未来的渴望是一致的。虽然梦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但先锋派不仅想要停止或中断时间，而且想要强迫时间进入未来。所以，这是一种主动的合作，而不是一种选择的从属关系。用戏剧导演、生物力学预言者弗塞维罗德·梅耶霍尔德(Vsevelod Meyerhold)的话来说，是时候创造一种“新的高速人”了。12

钢铁侠

我们可以通过无产阶级诗人阿列克谢·加斯特夫(1882-)的职业生涯来追溯这种缩小现在与未来之间差距的愿望

1939)。他的作品将驾驭共产主义加速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它似乎同时拥抱了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工作中最糟糕的一面，以及对工作作为陌生的自由场所的另一种乌托邦式的重新想象。加斯特夫是一名教师的儿子，他曾做过车床操作员、熟练的金属工人、有轨电车修理工，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1913年创作的《工厂哨子》很有特色:

> 人群迈着新的进行曲，他们的脚步已经赶上了铁的节奏。
> 手在燃烧，他们不能忍受闲散....
> 敬机器!
> 我们是它们的杠杆，我们是它们的呼吸，它们的动力

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新的速度感——“铁的节奏”——以及动物身体与机器的结合感——“我们是它们的呼吸”。

他在革命前流亡期间写的作品《表达——西伯利亚的幻想》(Express - Siberian Fantasy)中探索了这种对技术变革力量的看法。它通过“全景”特快列车的航行呈现了西伯利亚作为机器天堂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充斥着工厂和道路的西伯利亚的景象，火车“把人淹没在金属中”，它以暴力的方式将自然改造成人类的意志。在这个世界里，俄罗斯将与美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技术乌托邦，北极冰盖将融化由于全球变暖，我们现在会怀着恐惧的心态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改造，它在当时带来了和平与富足的梦想，带来了后来的敌对国家之间的融合。
加斯特夫对内战期间俄国劳工的落后感到震惊。然而，他把自己目睹的破坏看作是一个新的开始的可能性。在他的理论著作《*如何*工作》(*How to* Work, 1923)中，他写道:

> 被摧毁的太多了，被摧毁到疯狂的地步，被摧毁到年表被抹去的地步，但更多的是

> 开始，以开放的天真和信仰开始。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无条件地接受它，把它当作时代的情感和政治宣言来接受，把自己投入到新时代的漩涡中去，在这个漩涡中，大胆的理性主义必须是总纲领

我们必须欢迎年代学的终结，把它作为跳入新纪元“漩涡”的条件——一个我们能够理性地把握和控制生产的新时代。早在1920年8月12日，加斯特夫就成立了中央劳动学院(1920-1938)，并放弃了诗人和哈尔科夫艺术委员的角色。

加斯特夫关于“机械”和灵魂工程的诗意乌托邦幻想现在将付诸实践。加斯特夫的孪生先知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前者采用了科学管理技术，后者发明了大规模生产线。这些资本主义英雄将成为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工作方式的典范。加斯特夫的观点完全是反人道主义的:

> 没有灵魂，没有个性，没有情感，没有抒情，不再通过痛苦的尖叫或快乐的笑声来表达自己，而是通过压力计或计价器来表达。大规模工程将使人成为社会的自动化机器

正是加斯捷夫对机械化社会的设想，在他的小说《*我们*》(1921)中引起了伊夫根尼·扎米亚京的讽刺扎米亚京的英雄D-503会像加斯捷夫一样崇拜泰勒，也体现了加斯捷夫用数字来命名人的梦想(加斯捷夫曾说过机械化“允许把无产阶级的单位划分为A、B、C、325、075或0”)。扎米亚京将加斯捷夫眼中的乌托邦描绘成反乌托邦。

加斯捷夫并不孤单。他引用了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古拉·布哈林对共青团(“全联盟”)的一次演讲

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主义青年团)宣称:“我们必须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最多数量的准备投入流通的专门的活机器。”’ 19“活机器”是打破现存生产关系和加速超越资本界限的梦想。在这种观点看来，对共产主义的检验，是它超越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当然，这似乎导致了两个世界最糟糕的结果:采用最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并以独裁和专制的形式实施这些技术。

加斯捷夫不仅仅是后来斯大林主义把人从属于生产的预言者。相反，他的作品在机器和劳动力转型的空间中令人不安地保持平衡，正如罗莎·费列弗(Rosa ferr<s:1>)所言:

> 20 .加斯捷夫的技术乌托邦既是一种对机器、干净的玻璃和钢铁的赞美中带有幻想和感性内涵的美学概念，也是一种旨在改善工人条件的实用思维方式:现在最好地避免事故，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绩效

他的乌托邦并不是建立在对劳工的动员和残酷化之上的，比如在斯大林主义下对奴隶劳工的使用。相反，加斯捷夫笔下的工人远非机器、动物或机器人，而是“生产过程中活跃的、有知觉的、有创造力的一部分”。本着列宁对无产阶级泰勒主义的希望精神，工人完全服从于工作的目的是让工人在工作中自由地梦想，并尽快逃离工作的严酷，过上积极的生活。加斯捷夫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的不相容很快变得残酷而明显。

节奏决定一切

斯大林策划了他在列宁死后掌权的过程。1928年，他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了新经济政策，重新夺回了

战时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能量导致了迅猛的工业化进程和对农民的灾难性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在四年内完成了。其结果是比1917年至1928年间进行的更为激进和破坏性的社会改造，但也放弃了所有各种各样的、自主的革命乌托邦的努力，转而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单一乌托邦。22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保守主义者”斯大林用乌托邦的比喻来反对乌托邦主义者，坚持纪律、服从和顺从，以实现必要的历史“加速”*(uskorenie)*，而“放慢节奏”*(gromozhenie)*将成为一种反革命行为。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欢爽”通过屈服于劳动，提供了加速的受虐牺牲的“快感”

现在是斯大林控制时间了，他批评那些试图走得太快的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同时也坚持认为任何放慢都是不可接受的。斯大林主义的时间口号宣称:“在重建时代，速度决定一切”。安德烈·柏拉图诺夫关于斯大林主义集体化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基坑*》(写于1930年，但直到1987年才出版)不断地重复使用“节奏”这个词。小说关注的是为未来无产者的房子挖掘基坑，以及消灭富农，即“富农”，他们被送上木筏顺流而下。

它还包括了可能是最奇怪的尝试，以描述新斯大林主义的冲击工作节奏。村里的铁匠有一个“最后一个不知名的无产者”和集体农场上“剩余被剥削劳动力”的最后一个例子作为他的助手:一只在熔炉上锤头的熊事实上，铁匠铺是一个“冲击”车间，熊不仅是最后一个无产者，也是第一个冲击工人*(udarniki)*。在被带到集体农庄去谴责富农——实际上是那些虐待他的人——之后，熊看到了一面横幅:“为了党，为了党的忠诚，为了震撼工人为无产阶级强行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熊完全接受了这条命令，开始用锤子锤铁

疯狂的速度，让村民们很苦恼，因为它的劳动可能会破坏铁。

熊预示着“冲击式工作”的破坏性过剩是生产的风暴，它试图通过“把所有这种愤怒的、说不出话来的快乐投入到劳动的热情中”来强行打开通向无产阶级未来的大门。安娜·埃佩尔博因(Anna Epelboin)认为熊不仅预示着加速进入未来，而且是“最终毁灭的代理人”，“威胁着让世界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在柏拉图诺夫的观点中，当革命转向它的对立面时，斯大林主义的节奏反转了——破坏取代了生产，秩序被揭示为混乱。
阿列克谢·加斯捷夫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命运，反映了他的乌托邦加速适应这种新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冲击作品的不可能性。加斯捷夫在1918年写了一本名为《*工人的打击之诗*》的诗集，有些人错误地把它翻译成《*震撼之诗*》。然而，加斯捷夫试图理性地控制工作，这与冲击工作的“风暴”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混乱是相反的。当然，加斯捷夫确实试图遵从新政权，但斯大林主义者认识到这种不相容。1938年，中央劳动学院被关闭，同年9月8日，加斯捷夫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恐怖活动”。1939年4月14日，加斯捷夫被判有罪，判处死刑，次日枪决。乌斯特利亚洛夫(N. V. Ustryalov)说：“革命不仅对落后的人是无情的，对跑在前面的人也是无情的。”[28]

加斯捷夫在斯大林监狱系统的结局也揭示了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凯特·布朗已经证明了古拉格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对劳动的纪律训练和组织。古拉格是用来统治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系统在没有私人属性制度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使用了各种形式的分区和内部护照管制，这种制度通过赚取工资和负担得起住房的需要来限制人们的定居。大部分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的人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古拉格除了提供奴隶劳动外，还起到了限制和限制的作用

同时也控制了劳动自由。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政治”废除了将活劳动融入机器的梦想世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社会调节和空间化对奴隶和不自由劳动的残酷组织。

《风暴天堂》

我认为，共产主义加速主义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回答资本主义的动态，在这种动态中，活劳动(即人)被“死劳动”(即机器)排挤。共产主义加速主义试图以两种方式回答这一动态。首先，它试图扭转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依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死劳动不是从属于劳动，而是从属于劳动，是铁人对抗有血有肉的人。’ 30加速主义，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通过将有血有肉的人与铁人融合来回答这个问题——将人与机器，或人与机器结合起来，将活劳动融合和注入死劳动。这将变异成“人机”的半机械人幻想。工人将不再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而是将控制和指导机器，将资本主义技术改造为共产主义目的。

其次，机器将被用作活劳动的替代品，但不是以导致失业或为机器工作的痛苦的资本主义形式使用。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结合意味着死劳动并不是代替活劳动，而是它们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工作。这台机器可以用来解放人们，让他们参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为数不多的积极看法之一:

>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调节着一般的生产，从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晚饭后批评，就像

我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从未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评论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田园风光将是彻底工业化的结果，是利用机器来调节和减少劳动的结果。

这就是共产主义加速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在其中，对人类完全机械化的表面恐惧，实际上被视为对劳动的解放。借用列宁的话，我们可以说，公式是泰勒+傅立叶=共产主义。Fredrik泰勒关于工作场所效率的技术将导致傅里叶主义关于投入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愿景。然而，正如加斯特夫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思考的结果“在最高程度上是悲剧性的”。事实上，这个制度无法实现激励它的梦想。克里斯·阿瑟曾尖刻地指出:“苏联体制不是节约劳动力的体制，而是囤积劳动力的体制。32 .劳动力的囤积恰恰是为了在计划截止日期前进行“风暴”，这是就业保障的结果。“问题”在于，资本的劳动纪律，其中泰勒主义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形式，不能有效地运作。然而，对于苏联加速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种保证中，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当然，通过古拉格群岛，斯大林主义会产生新的劳动纪律形式。
这种情况的重复，我们在古巴革命中简要地提到过，但也谈到了毛主义的“大跃进”，也会重演悲剧。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被证明比最初看起来可能的更加顽固地为劳工服务。我认为，正是这种失败的经历，促使加速主义接受甚至颂扬资本主义的坐标。加速主义并没有试图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是庆祝劳动消失在资本*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了资本主义的要素

共产主义的加速主义梦想和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幻想。

3
机器存在

托马斯布林克曼的1998年极简技术轨道'机器'，记录下的名字Ester布林克曼，包括一个重复的声音样本，在3.18开始。这个声音用德语说：“Ich will eine 机 器 sein”。Arme zu greifen Beine zu gehn kein Schmerz kein Gedanke。“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手臂可以抓，腿可以走，没有疼痛，没有思想。样本是einst<s:1> rzende Neubauten乐队主唱Blixa Bargeld的声音，来自他们的专辑《Die Ham*letmaschine》，这是海纳*·米<e:1>勒同名剧作的配乐。在布林克曼的手中，样本以半模仿的方式重复了机械加速和整合的技术修辞，从Kraftwerk到底特律再到谢菲尔德。尼克·兰德(Nick Land)所赞美的“疯狂地去人性化的机器音乐”在这里放慢了速度，以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科技节奏重复着。1这个样本为批判性的检查提供了机器整合所承诺的从感觉和意识(“没有痛苦，没有思想”)中退出的机会，我认为，这是加速主义的幻想基础。

在本章中，我想探讨人类与机器承诺的整合中这些幻想的和性欲的因素，这在加速主义中是如此普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讨论两个典型的、间隔很广的时刻:第一个是维克多·陶斯克(Victor Tausk)关于“影响机器”的精神分析研究，发表于1919年，就在他同年开枪自杀和上吊之前不久。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以近乎无情的诚实写道:“我承认我并不真的想念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毫无用处，甚至对未来构成威胁。陶斯克的“机器”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得到了加速主义的改造*，从幻想的状态转变为

欲望-生产的真实。第二个时刻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1973)，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探索了机械整合的精神病理学。品钦的小说将被控制论文化研究单位(CCRU)(我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作为赛博哥特重新混合的文本之一，并被视为技术加速的宣言。在这两种情况下，我所关心的是回到这些时刻，作为加速的意识形态幻想中力比多尔元素的关键。

《神秘的机器》

在他的开创性论文《*精神分裂症影响机器的起源*》(1919)中，维克多·陶斯克概述了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所遭受的与机器认同的病理体验他勾勒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感觉到被一台机器所控制的，这台机器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图片，产生或消除思想和感情，控制我们的身体，产生奇怪的感觉，或者产生身体疾病:

> 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机器是一种具有神秘性质的机器。病人只能对机器的构造给出模糊的暗示。它由盒子、曲柄、杠杆、轮子、按钮、电线、电池等组成。病人努力通过他们的技术知识来发现仪器的结构，似乎随着科学的逐步普及，技术上已知的所有力都被用来解释仪器的功能。然而，人类的所有发现都被认为不足以解释这台机器的神奇力量，病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迫害。

如果这台机器是模糊的，那么它的操作也是模糊的:病人很少清楚地知道它的操作。按钮被按下，杠杆动起来，曲柄转动。技术的黑盒

设备的功能在界面后面变得不透明，就像电脑一样，这使得所有机器的体验都像是这些幻想中的“影响机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把机器看作是受迫害者，就像我们与机器讨价还价，希望它们能工作，或者猛烈地攻击它们一样。并不是只有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受到机器的影响。

陶斯克认为，这种对机器的病态投射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疏离。这一过程背后的病理是由于自我的形成——这种自我意识将我们与世界区分开来，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或侵蚀了这种自我意识。陶斯克认为，影响机器的起源在于自恋早期的性欲紊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同自己的身体，对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特别是，继弗洛伊德之后，陶斯克认为这个问题是与同性恋性欲斗争的结果——性欲直接指向我们自己的身体。这种欲望的社会不可接受的本质驱使我们将这种性欲投射到世界上。

孩子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身体是自己的，是与世界分离的。相反，他们必须逐渐认识到身体的所有部分，即陶斯克所说的“disjecta membra”(散落的碎片)，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将性欲作为整个身体的形象投入到自我中。一旦这一切发生了，就有可能把这个形象投射到世界上。影响机器的病态投射是对我们试图通过投射找到自己身体的阶段的回归。我们回到了一种感觉，即我们的身体仅仅是碎片，因此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为了应对由于我们无法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而导致的焦虑体验，性欲被投射出来，然后作为迫害回到我们身边:“被疏远的器官——在我们的情况下，整个身体——看起来像一个外部的敌人，像一个用来折磨病人的机器。因此，影响机器是“投射在外的部分或全部病理改变的器官(整个身体)的总和”。

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奇怪时，我们会把这种感觉投射到“影响机器”上，然后它就成为我们身体异化的“原因”。用陶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从“自我疏离感”转向“参照错觉”。然而，机器仍然是无法解释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无法抓住的机器是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自己生殖器的象征。为了压抑这一事实，我们将机器复杂化以掩饰其象征意义，从而导致影响机器的复杂性。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把机器当作投影的处理方式*对他们来说，机器只能永远是真实的，在生产欲望的“真实”意义上。“真实”被大写是为了表明这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过度的生产力，它只是被冷却下来形成表面上的“真实”。这是一种把现实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现实的形而上学。它是加速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可以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一种力的形而上学——生产力、毁灭力、人类、机械和控制论的力量，这些力量必须被焊接或融合在一个内在的平面上。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如果像陶斯克那样，将现实视为一种病态的符号，那么这种作为内在生产的概念就会被中和或引入歧途。

然而，我想在陶斯克身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加速主义者将一切转化为实际生产的愿望施加压力。这两个术语——“真实”和“生产”——作为力比多幻想产品是有争议的，这是我的攻击路线。我认为，加速论者将幻想瓦解为现实，是幻想试图将现实本身生产出来的一种标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回避了拟像性和幻想性的生产概念的问题。这是幻想终结的幻想。它也回避了这种与机器认同的病态和痛苦元素，回避了这种极端体验所证明的身体与其整合之间的摩擦。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回到陶斯克。

陶斯克的案例研究是以“娜塔莉亚A小姐”为基础的，这位31岁的前哲学系学生认为自己被前未婚夫操纵的机器控制了。这台机器以她的身体为形状，象征着一个棺材盖形状的箱子，里面内衬丝绸或天鹅绒。起初，机器的四肢是自然的，然后只是画在棺材的盖子上。头似乎不见了。机器的内部部件是由电池组成的。对陶斯克来说，这台机器既是生殖器的投影，也是病人身体的投影。随着投射变得更强，它变得更像一台机器，而不像一个保护她在机器中不认识自己的身体。

这台机器是由爱的对象操作的，这是力比多转移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亲密的爱情对象也受到了迫害，这是因为我们因为流动的自我边界而没有将它们与自己区分开来。因此，那些操作机器的人是距离较远的爱情对象——医生、恋人、追求者，或者像娜塔莉亚A那样，是一个变性人。投射到机器上的“身体”被认为是生殖器，这使身体充满了性欲区。越来越不真实的机器变成了一个去实现的力比多的形象，一个渐行渐远的*欢爽形象*。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这种体验视为分裂机器的碎片性多样性，超越了弗洛伊德和陶斯克等精神分析学家所强调的规范化的身体和规范化的自我。他们将精神分析所宣扬的整体性和整合性视为真正的偏执幻想，与之相对的是，他们试图将这些冻结的投射释放到交换和互动的区域中。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不是强迫患者认识到一个虚假的投射，并将其归还给自我，而是去拥抱偏执所冻结的碎片化和离散化的可能性。

虽然这为精神分析的一些规范性投射提供了有益的纠正，精神分析承认碎片化和多样性只是为了始终坚持回归自我和结构，但它有可能错过标志着人类与机器关系的焦虑和偏执，以及人类与我们的机器之间的关系

身体。我不想通过加速主义者对精神分裂之旅的拥抱来爆发偏执，我想更密切地关注“影响机器”揭示的问题，即我们自己的机器本质与劳动和生产的重复相吻合。

陶斯克强调了这种异化的力比多维度，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我们自己成为机器的恐惧——我们自己的力比多的机器性质，以及机器对我们身体的日益渗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使我们沦为机器的“纯粹附属物”。在影响机器的情况下，当我们成为被投射的机器的性欲操纵时，这一点被字面化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影响机器价值的选择说明了他们是如何欢迎这种整合的——身体在去地域化的路线上的爆炸或资本的流动。我们发现机械的身体是饱和的力比多区。相反，对有影响力的机器的幻想则打断了这种顺畅的整合回路，暗示了身体和机器之间的转移区永远无法实现顺畅的整合。

火箭人(Rocketman)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51年出版的《*Minima Moralia*》(Minima Moralia)一书中收录了他尖刻的战后反思，他评论了新的死亡技术对我们历史观的影响:

> 如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涵盖了这个时代，那么希特勒的机器人炸弹就会在亚历山大的死亡场景和类似的图像旁边，在经验选择的事实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些事实中，世界精神的象征状态被直接表达出来。就像法西斯主义本身一样，机器人是自我操纵的，但又完全不受支配。就像前者一样，它们将技术上的极致完美与完全失明结合在一起。和前者一样，它们播下了最致命的恐慌，完全是徒劳的。-“我见过世灵，”

> 不是骑在马背上，而是骑在翅膀上，但是没有头，这就立刻驳倒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无主体”武器——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体现了对历史作为潜在理性过程的驳斥。今天的世界精神不是一个人，对黑格尔来说是拿破仑，而是一个自我导向的装置。用当代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世界精神是一架无人机。

在《*速度与政治*》(1978)的一些神秘段落中，保罗·维利里奥转向了轮回的形而上学——灵魂的轮回——暗示了灵魂在各种代谢载体上的负荷的紧张。维利里奥认为灵魂是“多元的，多种形式的，流动的，凝聚在社会，动物或领土的身体中。”[6]军事阶级的哲学或神学是诺斯替派的，因为它假设“强大的”灵魂是去疆域化的、流动的和可转移的，而“弱小的灵魂”则被囚禁在身体和世界中。维利里奥将这个强大的灵魂比作“gyrovages”，中世纪早期，流浪和流动的僧侣经常因为他们的寄生流动性、出售假文物和暴饮暴食而受到教会的谴责。在这个军事诺斯替主义中，加速不仅仅是车辆的加速，而且是灵魂平稳地从一个化身移动到另一个化身的“纯粹”加速，因此能够超越任何领土占领。

当然，对于维利里奥来说，这种去地域化并不值得称赞。它体现了“纯粹战争”的虚无主义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全球空间成为这些超然灵魂的游乐场。军事诺斯替主义体现了一种纯粹机动的幻想，在托马斯·品钦1973年的小说《*万有引力的彩虹》中找到了共鸣的文学形象*。小说背景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是对蒂龙·斯洛斯罗普(Tyrone Slothrop)在“区域”(战后德国的遗迹)中流浪的流浪汉式探索。斯洛斯罗普在婴儿时期就受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影响，他对神秘的塑料Impolex G.[7]产生了性敏感。这种塑料被用在德国V-2火箭上，多亏了他的条件反射

导致斯洛斯罗普在攻击前勃起和性接触。条件作用使斯洛斯罗普成为一台受条件作用控制的机器:“勃起嗡嗡作响……就像一台仪器，被他们安装在他的身体里，就像一个殖民地前哨。”8

斯洛斯罗普漂泊在这个区域，被抛回梦境、灵光闪现、预兆、密码学、药物认识论，所有这些都在恐怖、矛盾、荒谬的基础上跳舞。(582)这提前勾勒出了CCRU的加速论者可能采用的研究计划，他们在90年代运作，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遇到。战争中荒谬的加速力量粉碎并引爆了斯洛斯罗普的同一性，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斯洛斯罗普的碎片已经成长为他们自己的一贯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现在的区域人口中有哪些是他最初分散的分支”(742)。斯洛斯罗普一贯的角色之一是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火箭人”，这已经暗示了人与机器的幻想融合。

然而，斯洛斯罗普受到更深刻的阴谋力量的影响，从工业卡特尔到战争以自己的形象重新配置时间和空间的方式。(257)品钦像往常一样，带着几分半开玩笑的语气，暗示“(战争)秘密地被技术的需求所支配……被人类和技术之间的阴谋所支配，被需要战争能量爆发的东西所支配。”(521)“战争”和“技术”成为要求加速的力量，并要求人类融入自杀式的“战争机器”。他们还对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进行编码，正如陆军部存档的“手册”所述:“真正的战争是对市场的庆祝。(105)在品钦悲观和阴谋论的观点中，伟大的控制系统的出现正是通过能量和加速度来运作的。

在纳粹战败后，火箭机组人员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人类乘客被整合到剩余的纳粹V-2火箭中，这是这种重新配置的最终形式。当然，与陶斯克的观点一致，我们几乎没有比V-2更具性幻想的融合了。V-2也是一个神秘的

文字或符号，一个人“被撕成碎片，被注释，被解释，被手淫，直到它的最后一滴都被挤软了”(520)。V-2是阴茎作为精子逻各斯，作为无穷无尽的解释符号。品钦追溯了围绕火箭的神学和异端邪说，但从未触及其核心:

> 诺斯替教徒被风与火的冲击带到了火箭宝座的房间里，卡巴拉教徒把火箭当作托拉来研究，一个字一个字地——铆钉、燃烧器杯和黄铜玫瑰，火箭的文本是他们的，他们要排列和组合成新的启示，总是在展开，摩尼教徒看到两个火箭，善与恶，他们一起用原始双胞胎(有人说他们的名字是恩兹安和布里塞罗)的神圣习语说，一个是带我们去星星的好火箭，一个是毁灭世界的邪恶火箭，两者永远在斗争。(第727页)

V-2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形而上学，它们试图关闭任何“库特对应”的符号，但却失败了(590)。

事实上，乘客与V-2的结合与其说是生殖器崇拜，不如说是受虐狂。乘客是戈特弗里德，布里塞罗船长的情人，他遭受了布里塞罗的受虐和乱伦仪式。这件事在戈特弗里德被塞进V-2的一个特殊隔间时达到高潮，他身上裹着Impolex-G的裹尸布。这里的幻想虽然是终结的，但却与荣格的乱伦思想相呼应，认为这是重生和个性化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它也修改了阿多诺关于希特勒的机器人武器“完全不受主体支配”的主张。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是受虐的——是将主体整合到机器的无用轨迹中。不同寻常的是，这样的结论可能比阿多诺的结论更悲观，因为有一个主题是综合的，但他们没有指导的作用。这与阿多诺关于主体在现代性中无效化的悲观结论是一致的，但这是一种

被欢迎和接受的无效化。在品钦的文本中，整合的加速幻想达到了自我取消的字面终点。

然而，这样的结论可能只是另一个“库特函件”，另一个V-2神学。当然，正如CCRU所做的那样，将《*万有引力之虹*》解读为加速论者是有可能的。而不是法西斯主义通过融合强化或确保同一性，在这里，我们有溶解和分裂通过融合加速战争技术。用一个经常被滥用的词来说，这是一种后现代加速主义，它引爆或驱散了现代主义或前卫加速的集中力量。品钦在《*V*》(1963)中所说的“灵魂异装癖”，或者如维利里奥所说的“流态灵魂”，可以被装载或分布在各种载体上，以至于我们欢迎自己的解体
我们看到幻想的崩溃，也看到虚构空间的崩溃，进入生产和加速的现实。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指责这是我们语言和符号化能力的精神崩溃，那么回应可以简单地说，你还没有真正走到最后……无论想象或思考纯粹的内在性是多么不可能，对这种体验的吸引力都像乌托邦的承诺一样具有无情的吸引力。把幻想付诸行动，意识到我们自己是生产机器，意识到我们个性的分散是一扇门，这就是加速主义的承诺。然而……

在品钦的挑衅下，维利里奥对登上新陈代谢的交通工具的洞察，表明了在技术、军事力量和资本主义的动态中，对人与机器的整合和分散的形而上学的渴望。正是这种分散的动态在当代对抗议和斗争的描述中经常受到称赞，这些抗议和斗争被视为可以抵抗权力的身体(包括技术身体)之间共鸣的实例。困难在于，这些新陈代谢的载体，也就是活生生的身体，有被他们的斗争同化为资本主义坚持认为我们是无穷无尽的可转移和流动的劳动力的同一动力所封锁的风险。失去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即身体对融入流动和

流动，因为斗争的真正加速被视为从国家和资本的限制中逃离的一条线。

性工作-机器

大多数工作的经历都是极度无聊和无意义的——几乎没有加速的经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工作是永恒的“同一性的地狱”——重复的、常常是荒谬的任务，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没有任何用处伴随这种体验的是情爱幻想，这是一种在力比多加速下，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对情爱可能性的无尽变化和探索的体验。那些熟悉最无聊的工作形式——工厂工作、办公室工作——的人，也会熟悉关于性的无休止的交流和话语。人们传扬着色情作品，讨论着同事的性可能性，脑子里充斥着性欲。

机械整合的力比多幻想，虽然是“病态的”，却暗示了力比多加速与重复性和机械性的劳动加速的乌托邦式融合。对于加速论者来说，这种注入或融合产生了一种多样性，在新的生命可能性中引爆了自我的极限。生产的真实，随着欲望注入机器，打破了迭代的常规。工作(终于)变得性感了。虽然这是一种没有感觉或思考的状态，这也可能表明性可能是工作式的……

如果像精神分析学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性的体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复和无聊的，那么这种融合就不必走得太远。看似无穷无尽的情爱可能性，在我们自己独特驱动力的场景中被冻结了。正是萨德侯爵的作品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模式是重复的，甚至是劳动。《*索多玛的120天*》(1785年)的无情迭代产生了一种沉闷的定时劳动感，强度和活动性都在增加。阿多诺评论说，萨德的狂欢就像机械的芭蕾舞。’[12]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面对流动生活和流动生活的融合

变成了消音和异化的劳动，也变成了将重复性和消音的性冲动回路整合到消音的劳动回路中的欲望。虽然加速主义可能承诺在机械的“合成”中整合欲望和劳动，以加速工作的无聊，但它掩盖了欲望的无聊。加速主义想要把性妖魔化为加速的、机械的东西，远离幻想的反复幻想。

融合的幻想，就是废除幻想的幻想。加速主义承诺的是人与机器的融合，性与工作的融合，以及生产的真实的生成。这样，作为通往真实的通道的幻想就崩溃了，变成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直接的真实体验，无需中介。虽然用力比多的术语来表达，但被消灭的是力比多，因为加速主义将劳动的麻木经验作为受虐狂享受的场所进行了再现。与此同时，由于实际工人未能充分“享受”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对他们表示蔑视。其结果是通过声称立即获得欲望并幻想般地解除僵局来逃避欲望的僵局。这就是加速主义的力比多幻想。

4

赛博朋克照片主义

我在分散和松弛的后现代性形式中追踪到的现代主义线性动力学的进展和加速似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无论是未来主义者、资本家还是共产主义者，先锋派的“对真实的热情”，[1]试图加速我们走向新的人类类型，现在看来是古怪的、庸俗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可疑的。然而，高速机器的梦想和现实并不仅仅是令人怀疑的怀旧之情的范畴，这种怀旧之情存在于汽油头男子主义的残余或对当代军事技术的盲目崇拜中。

今天，加速已经从汽车——大众速度和现代性的典型技术——转移到了电脑上。如果正如恩达·达菲所说的那样，汽车对许多人来说是现代主义时代的生活体验——当现代主义倾向于封闭的时候，汽车是一种新的大众审美——那么今天电脑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正是电脑，尤其是对那些与电脑一起工作的人来说，体现了劳动的“加速”，因为每一款新车型都变得越来越快(或者这就是承诺)。互联网提供了“一键式”解决方案，电脑加速瘦身，似乎提供了最后一个值得任何商品拜物教的乌托邦残余;电脑变慢或死机带来的挫败感，正是我们自己内化的对速度的需求指数。计算机现在也代表着速度与战争的联盟，因为计算机处理的加速使得“先开火后遗忘”的战争、无人机攻击、民用空间的军事化以及(用美国军事术语来说)“杀伤链的压缩”变得迅速。

因此，加速的人机一体化并没有简单地消失，而是发生了变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评论道:

> 在计算机被广泛使用之后，没有出现伟大的乌托邦文本(最后一个是1975年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投入使用)。相反，我们有赛博朋克的自由市场癫狂，它假设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差异和多样性的乌托邦

赛博朋克不仅是差异和变异的乌托邦，也是谵妄和加速的乌托邦。这就是我想要探索的“乌托邦”，它比詹姆逊的否定所暗示的更持久、更强大。

这种新的美学可以被认为是在后现代性的松弛时期重新获得古典先锋派能量的尝试。它不是简单的对前卫的重复，而是一种变异和调制的未来主义，以典型的后现代时尚，跨越了流派、形式和文化领域。这就是我将称之为“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东西。当然，“赛博朋克摄影主义”带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媚俗色彩。“赛博朋克”这个词并没有真正从比利·伊多尔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恢复过来。“照片主义”是我通过芝加哥酸屋从业者的照片改编的，他们的“酸轨”(1989)被认为是酸屋的第一张唱片。话虽如此，或许其中的媚俗元素，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反映了这种审美的某种程度。

我将重点关注三个时刻:赛博朋克小说、底特律科技，以及它们在赛博理论中的综合。与我的总体论点一致，我对简单地表达对这种先锋派的祛魅感兴趣，并庆祝对当前“民主”协议的顺从。相反，我想探讨这些重新设计的加速主义形式，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变和连续性的回应。加速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好奇心，而是一种美学和政治态度，它继续对当下施加万有引力。

《物质化的刺激与威胁》

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原始文本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漫者*》(*neuroromancer, 1984*),*它可能是赛博*朋克最有效的宣言，并预言了赛博朋克后来所有的变异形式。这部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也是我心目中唯一一部成功的这种形式的作品(连同它的续集)，它追踪了控制论化身的新转变形式。“插入”网络空间的技术本身，在小说中，植根于军事技术的框架:“《黑客帝国》的根源在于原始的街机游戏，”画外音说，“在早期的图形程序和颅骨插孔的军事实验中。[4]此外，《夜之城》的著名描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疯狂实验，由一个无聊的研究员设计，他把一个拇指永久地放在快进键上”，[5]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以及对速度的强迫性依恋，这种依恋有望打破社会限制的束缚。这个比喻在“无聊的研究者”的形象中暗示，这种放松管制的幻想不仅仅是(反)计划和方向的元素，与头脑清醒的市场的幻想相反。虽然速度是对社会和虚拟空间的新的去地域化流动性的开放的承诺——超越了福特主义的社会契约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静态”分割——这不是一个盲目的过程。吉布森这部小说的历史意义(撇开审美判断不谈)在于，它在焦虑和认可、批判距离和沉浸式的*欢爽之间保持平衡*，在它对网络空间、社会关系的增强和加速解体的愿景中保持平衡。

约书亚·克洛弗指出,《*神经*漫漫者》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核心的“非物质化的刺激和威胁”;[6]是新的流动形式的积累和超级财富的刺激(对极少数人来说)，以及过时和被抛弃的威胁(对许多人来说)。在吉布森的小说中，刺激在于抛弃自我，借用理查德·摩根(Richard Morgan)的科幻小说《*变碳*》(Altered Carbon, 2002)中的一个术语，“脱套”意识，从物质支持中解脱出来。威胁在于被谴责为“肉”(身体)，并被排除在网络空间的乐趣之外。这就是小说开头的黑客Case的命运，谁都有过

由于之前的一次创业失败，他被手术切除了千斤顶的能力。然而，我们可以把《克拉弗》改写为说，小说的赛博朋克摄影主义也抓住了“*物质化的刺激和威胁*”。这里的刺激是增强和整合，从塔利·伊沙姆(“长着蔡司-尼康眼睛的女孩”)到莫莉·number(植入了可伸缩的刀片植入物)。威胁来自于糟糕的技术、糟糕的手术，以及在加速的未来竞赛中落后。加速进入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视野——作为一种纯粹的动力和积累的社会形式，摆脱了对劳动力的依赖——总是被我们的过时所困扰。吉布森的小说以反乌托邦的形式追踪了资本主义乌托邦，将自我从字面上看作是福柯已经剖析为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创业机器”

技术-普图主义(Techno-Phuturism)

切换到另一个场景，我认为，底特律的科技构成了赛博朋克摄影主义中最迷人、最成功的美学例子之一。刻意将其表述为后工业时代的非洲未来主义，旨在“抹去”(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摩城福特主义声音的痕迹，并模仿福特用“不变资本”(即机器)取代“可变资本”(即人类)的新机器人生产线。这种所谓的“自动化”在20世纪70年代被激进的黑人工人称为“黑化”——通过超级剥削在不安全的条件下系统地强迫生产他们对新高科技生产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是生产线上老式的加速生产。再一次，我们可能会对我们所遇到的加速图像持谨慎态度。

底特律科技追溯了底特律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从1967年起义后的“白人逃亡”，到随后的去工业化，以及它在贝尔维尔高中郊区的位置，先驱德里克·梅、胡安·阿特金斯和凯文·桑德森在这里相遇。混合欧洲音乐

影响(Kraftwerk, New Order, Depeche Mode等)与Parliament / Funkadelic的底特律放克，结果是一种独特的形式，违背了后现代拼贴的*综合*加速研究反射。

底特律科技舞曲的轴心是对先前迪斯科和豪斯舞曲形式的速度(以bpm为标准)的提高，以及对那些通常主导这些形式的人文主义残余的剥离——尤其是声音。它的美学发明的独特性在于它对美学的“机械化”，或者更好的“计算机化”的欢迎(这显然已经被Kraftwerk的“*人机*”(1978)和“*计算机世界*”(1981)所预示)。这种形式的典范，至少在我看来，是Rhythim(又名德里克·梅)的作品《it is what it is》(1988)。用当时一种半讽刺的描述来说，这是“带着哔哔声的舞曲”。保留放克，坚持底特律技术有乌托邦，如果不是庸俗，科幻未来主义的元素与城市空间的反乌托邦碎片相结合(' Night Drive through Babylon '，正如Model 500的曲目所表现的那样)。再一次，这种模棱两可存在于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中:是逃避未来，逃避劳动，还是失去劳动，未来崩溃为永久失业?

90年代出现的底特律电子/技术二人组Drexciya明确地表明，一次性*劳动*身体的历史更悠久。他们的名字，正如他们1997年的专辑《The *Quest*》*所透露的那样*，指的是一个水下国家，那里居住着从奴隶船上被扔下的非洲孕妇未出生的孩子，这些孕妇已经适应了水下环境这种非洲未来主义的科幻愿景将尖端的当代技术与被遗弃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逃脱”了奴隶制的命运，他们的后代在底特律的工厂里工作，然后被资本主义抛弃，陷入贫困，毒品和监狱。在这里，未来被不可能的劳动的痕迹所困扰，它与加速主义连续体的可能性破裂沿着这些思路，底特律技术可以被重新解读为对加速“平滑”的批评，通过重复破坏未来而不是加速主义的认可。

这两个时刻的拼接，以及以明确的加速主义形式全面发展的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真实实例，可以在上世纪90年代尼克·兰德(Nick Land)和他在控制论文化研究单位(CCRU)的盟友们的作品中找到。这个1995年在华威大学成立的“游牧民”(反)学术团体，通过Gilles Deleuze和f<s:1> lix Guattari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反俄狄浦斯》*(anti- oedipus, 1972)*，表达了对科幻和科技驱动的“分离合成”。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前卫的实践，突破90年代惯性的局限。

这种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冲动”是通过一种新的加速激进化来实现的。通过赛博朋克小说和后锐舞加速的丛林和鼓和贝斯，尼克·兰和CCRU的话语旨在最大限度地强化内在性，直到“即将到来的人类灭绝变得像舞池一样触手可及”。[11]锐舞文化的大规模药物实验也被拼接到这种诱变的混音中。根据尼克·兰德的说法，它的目标是沉浸在内在，这在2012年(!)已经实现了。就目前的怀疑主义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兰德的预测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表演小说，它创造了它所预测的未来——而且他的理论(根据兰德的说法)扰乱了线性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在当下，我们只有未来的痕迹——药物、科幻小说、丛林、理论、生物技术——这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崩溃:“仿佛明天的卷须正在向后钻洞。”’ [12]

尼克·兰(Nick Land)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最初的加速主义构想的重述和重新融合，最好地诠释了这场通往已实现未来的竞赛。兰德给这种加速主义赋予了一种故意挑衅的、后朋克式的反社会主义和反社会民主的形式:

> 因此，机械革命必须走向与社会主义调控相反的方向;将那些正在撕裂社会领域的过程推向更加不受约束的市场化，随着“市场的运动”而“进一步”发展

解码和去地域化”和“一个人在去地域化的方向上永远走得不够远:你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13]

在兰德的形而上学中，机械革命达到了绝对去疆域化的地平线——实现的资本主义已经将自己斩首为成熟的内在市场化。

这种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源自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显然，市场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垄断的反市场，束缚了交换。然而，对于布罗代尔来说，市场的优点在于它们是面对面的、局部化的和可控的。作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其问题在于它是投机性的、不透明的和例外的兰德改变了这一论点，将市场与可怕的强大的控制论力量联系起来，这些力量是“投机性的、不透明的和例外的”。正是这些交换的力量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停滞*。一种净化的资本主义，摆脱了国家的命令，将跨越到纯粹的市场，完全加速脱离资本主义。

这一理论依赖于90年代的局部经济“繁荣”，其中，至少在英国和美国，声称与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些脆弱和残余联系的政权，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弱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孕育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修辞，主宰了对那个时刻、00年代和当前危机时期的感知。在这一话语中，正是“左派”(或伪左派)和国家权力中的“左派”，授权、批准并加剧了金融化和消费信贷的过度。正是国家和公共部门的支出，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过度支出，被视为现在阻碍我们向未来再次飞跃的“累赘”。现在的政治家可以打紧缩牌来消除这种国家和公共债务，而加速主义者的立场可以争辩说，唯一的问题是国家本身，这

没有充分释放这些进程。正是国家支出的“人道主义”残余未能达到资本主义的反人道主义。

CCRU的立场，尽管其激进的反人道主义和非人道的沉浸式资本主义突破自身极限的承诺，与这些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即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贯彻到底。在这种叙述中，资本主义的加速被国家支出和国家监管(在英国，通常集中在“健康与安全”上，就像“健康与安全疯了”的比喻一样)所阻碍。一直走到资本主义(而不是一直走到左派……)是“左派”勇气的失败，这让我们陷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
在尼克·兰(Nick Land)的著作中，这个受限资本主义的故事与一种转变联系在一起，即中国是唯一*真正愿意*走完全程的国家形态，或者*已经*走完全程的国家形态，因为“来自未来的新中国”。[15]中国在后毛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拥抱中所能提供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加速(“休克式工作”，快速而暴力的工业化)、毛主义的“大跃进”和资本主义加速(当然，尽管，极左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中国在其不妥协的发展动力下，国家指导的过度行为成为一种*乌托邦*元素。因此，兰德从学术界出走到中国当记者，就是对这一轨迹的个人拥抱。他最近对孟子·莫德巴格(又名计算机科学家和企业家柯蒂斯·亚文)的新反动理论的玩弄，使得对这部最新作品的批评显得多余

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更多地是反对*特定*类型的国家，并要求一个愿意在“特殊区域”中自我斩首的国家参与自我终结(允许这肯定不是中国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有毒核心，因此产生了反意识形态的漂移，但这种暴露的目的是重新连接并加剧这一核心的崩溃。

这些加速主义美学形式的政治变幻无常并不落在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令人厌倦的比喻上，而是落在与资本主义动态的这种困难而紧张的交织上。赛博朋克摄影主义中隐含的不仅是计算速度和能力增加的逻辑，还有资本主义正在保持其加速动态的主张，这一主张首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给出了最令人难忘的形式。虽然我们都熟悉“所有的固体都融化成空气”这句话，但赛博朋克摄影主义更能引起共鸣的一句话，尤其是尼克·兰德(Nick Land)所阐述的:“(资产阶级)把宗教狂热、侠义热情、市侩感伤主义等最神圣的狂喜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冷水中。[17]兰德的作品在这种“冰水”的流动中溶解了自我，尽管围绕他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表明了解散自我的呼唤的悖论:某种自我必须在那里经历这种溶解到内在的流动中，并对其自身的灭绝进行理论化或报告。

自我的这种溺亡与劳动问题密切相关。正是作为劳动主体，我们受制于自我，正是在劳动的控制论化中，我们从自我中被救赎出来。尼克·兰(Nick Land)在其1996年的著作《熔毁》(Meltdown)中宣称:“工业机器的部署是为了拆除无产阶级的现状，将其推向生化人杂交的方向，并实现劳动力的可塑性。”’[18]正是这种整合的可塑性，将无产阶级从历史的主体重塑为加速的消失向量。劳动的置换不会通过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加速主义来实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动态来实现。兰德在1995年的《没有未来》(No Future)中提出的另一个构想描绘了一种更可怕的命运:“整个劳动力市场周期模糊成了绞肉机。[19]现在，劳动力的命运不是简单地消失在一个加速的未来，而是像在肉类工厂一样被加工。兰德的话暗含了在机器加速中并通过机器加速而灭绝的悖论。控制论机器既从肉中解放出来，又毁灭肉，在沉浸于内在性的欢爽中得到解决。

兰德最后的理论文本，从90年代末到00年代中期，探索了非标准的数字和字母反系统。这些非常奇怪的实验文本，与QWERTY键盘和深奥的卡巴拉数字系统相结合，爆炸成一种超理性的故意无意义。它们延续了兰德的计划，通过一种戏仿的超理性，通过加速进入迭代，与西方理性的专制决裂。在与晚期未来主义的定性数学的一次奇怪的汇合中，兰德开始对作为反实践媒介、一种新技术的数字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计算机的数字场的一种回应，再次尝试在累积场内外刻下致命加速的破坏性时刻——释放数字的“能量”。

2000年3月10日星期五，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表明了控制论再生或生产力强化的空虚，这不仅仅破坏了兰德的计划。相反，它变得更加疯狂，更加密集，更加怪异，因为它试图从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金融冲击中提取任何剩余的活力痕迹。

今日停滞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 1998年的评论很好地概括了当代的情况:“今天，停滞在世界各地……当然，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能动的任何地方，并使后者过时了。”20能动性的失败导致了加速主义者的梦想，即通过在新的技术合成中合并人类和计算机来重新插入能动性。Gopal Balakrishnan在他最近对全球资本主义减速的调查中指出，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过剩的描述最初是基于“释放的核和控制论生产力”，然后“问题的焦点悄悄地转移到绘制一个不透明的、金融市场的伪动态世界。21在中心

两者的中心是计算机的速度机器。我们可能会说，詹姆森作品的转变并没有完全被赛博朋克摄影主义所接受，它仍然停留在最初的时刻。事实上，赛博朋克摄影主义常常含蓄地以“控制论生产力”的第一动态来对抗“不透明的、伪动态的金融市场世界”的涌现感。在当代加速主义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加速”要素(如高频交易(HFT))的模糊讨论中，情况就是如此。[22]

对于所有后现代的浮夸，网络加速主义更关心的是不透明性的爆发，而不是沉迷于通常的符号或模拟的游戏的陈词滥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用“真实的生产”来对抗“虚构的金融”，而是试图把“真实”作为*生产和流通*的“真实”来生产(将德勒兹、瓜塔里与利奥塔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赛博朋克的摄影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对真实的激情”，通过模拟和仿造的形式，加速走出和超越回路与肉体的二律背反。
当然，困难之处在于，它涉及到对一种被证明是虚幻的“生产力”加速动力的某种依恋，尽管这是某种由资本主义价值形式产生的物质上的“先验幻觉”。资本主义对积累的驱动，对劳动的挤压，以及通过抽象对存在的渗透，塑造了我们经验的条件，从而产生了一种可感知的动态经验。加速主义加强并庆祝了这一点，但它无法把握的未来是崩溃和危机的未来——加速的终点是资本主义的速度机器的停止。

这种减速并不意味着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终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加速主义是非常有弹性的。为了应对旷日持久的危机时刻，它拒绝被描述为对即将恢复的资本主义服务的准时中断，回归速度的吸引力是一个不足为奇的发展。正是通过抵制危机时刻的减速和自我，这种欲望才能获得购买欲

服务和怀旧的紧缩语言被用来作为补救措施(“保持冷静，坚持下去”)。此外，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据称是为了将资本主义从其自身的矛盾中“解放”出来，可以被重新编码为对现有障碍的新突破，包括主体性本身的障碍。加速主义的欲望可以陶醉于危机所造成的或用来解决危机的启示性破坏，并以此作为新的起飞的标志。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那么赛博朋克摄影主义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超越“超越资本”这一障碍的越界欲望。23

困难在于，这种“障碍”实际上是作为矛盾的社会形态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服务的东西。净化和刺穿“资本本身”屏障的永恒愿望，被编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遗传结构中。这让赛博朋克摄影主义陷入了一种不舒服的境地，它与资本管理者试图通过消除可变资本的累赘来诱导运动和加速的那些尝试相结合。这种融合可以被看作是赛博朋克摄影主义试图解决资本的“运动矛盾”的结果。它通过将劳动或可变资本*整合*为不变资本来实现这一点。劳动的潜在淘汰是通过暴力的扬弃来解决的，扬弃为机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计算机或控制论装置。然后，计算机的不断加速，通过处理能力、内存或软件升级的增加，有望最终跟上资本主义步伐的集成肉的升级:劳动2.0，或2.1，等等。我们认为劳动的“不朽”不是作为机器的“附属物”，而是作为机器的一部分。

维利里奥评论说:“日本神风特攻队将在太空中实现军事精英的协同梦想，通过在烟火神化中自愿瓦解这种载具武器;因为速度体的终极隐喻是它最终消失在爆炸的火焰中。’24这是与军事加速度挂钩的速度体的启示录实现(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看到的);另一种实现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加速挂钩的赛博朋克摄影主义的梦想中——消失在

融合。资本的永动机产生了对控制论加速主义的永恒诱惑。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加速资本主义，就再努力一次，去处理或取代劳动力和肉的拖累。问题的核心在于，赛博朋克摄影主义把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作为积累的持续强化和资本主义连续体的强化，交给了资本垄断。

5
《启示录加速》

在危机时刻，世界末日的欲望和幻想变得紧迫而真实。诺曼·科恩的《*追求千禧年*》(1957)提供了中世纪“革命末世论”周期性出现的秘密历史，以应对崩溃的社会秩序、贫困、疾病和战争面对危机，这些梦想家敢于想象一场天启，将世界颠倒过来，并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新的天堂，在那里王子们将向农民鞠躬。而成为现实的天启，就是镇压的天启。在德国农民战争(1524- 1526)期间，超过十万农民被杀害，托马斯·姆姆·恩策尔(Thomas m<s:1> ntzer)被处决，他是在酷刑下宣布“Omnia *sunt communa*”(*“所有的东西都是共同的”*)的领导人之一。科恩是一位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这些千禧年论者是20世纪“极权主义”运动的危险先行者，在1970年的版本中，他将这些中世纪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者与查尔斯·曼森的死亡崇拜联系起来，以此来谴责60年代的反文化。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情境主义者会有意地重新定义科恩，宣称这些反叛者不是非理性主义的症状，而是现代革命的先驱启示录的欲望是模棱两可的:既是安慰性的幻想，又是推迟的希望，而且潜在地刺激着激进的重新秩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和潜在启示录的时代，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抵抗运动的危机重叠在一起。资本主义连续体的这种断裂导致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想象，从*2012年*到历史频道的《人类消失后的*生活*》(Life After *People*)，这种想象产生了一个人类被“净化”的世界的梦想或噩梦。这些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动的

幻想只能想象在人类停止存在的条件下，我们堕落的世界得到救赎，或者被减少到“被拯救”的“正确”数量。然而，还有另一种启示录基调，也贯穿于当下激进和革命的思想之中:启示录加速主义。

如果说当前金融、生态和政治等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显示出历史最糟糕的一面，那么末日加速主义则试图将最糟糕的一面极端化。举几个例子，我们有佛朗哥·“比佛”·贝拉尔迪(Franco ' Bifo ' Berardi)的论点，即当前的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潜能(全球网络中的认知劳动)”的压力下灭亡的标志;[3]安吉拉·米特罗普洛斯(Angela Mitropolous)和梅林达·库珀(Melinda Cooper)声称，这场危机是由“自下而上的高利贷……超出了资本所能容忍的限度”造成的;以及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新政是不可能的”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出更激进的要求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努力呼吁在面对危机时要有一种新的创造性，并抵制通常要求牺牲和紧缩的呼吁，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些呼吁通常落在危机的受害者身上，而不是那些造成危机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还暗示，通过一种激进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狡猾”，最坏的情况将产生“好”，并保持在马克思最加速主义的范围内。他们的愿望是，再次沉浸在破坏性因素中，以提取一种可以粉碎资本主义的力量。启示录加速主义试图通过与资本主义连续体融合，试图与超出控制的力量整合，来加速资本主义连续体的断裂。我要争论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天启。

内在倾向

通过对马克思趋势概念的多重运用的探索，我们可以追踪到内在性和加速性的问题。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占有重要地位，用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的话说，马克思“非常不清楚”。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思考。马克思的断言是，这种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受制于反趋势。它导致了一场冗长的谩骂式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将不讨论这一争论，而是关注马克思对这一趋势的评论如何被重新加工成一种分析方法。正是这种倾向被视为打开危机和决裂可能性的钥匙。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他在关于“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的中心文章中的论点，即这种趋势是允许我们通过溶解资本的物化表象来把握历史进程的关键工具。Lukács对加速有针对性地指出:“当这个现实被溶解到以人为驱动力的过程中时，这个冻结的现实的形象立即被卷入了一场不懈的、幽灵般的运动中，它就变得有意义了。”[8]“现实”的形象，既冻结又在运动，必须被溶解，以揭示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的行动。

这种趋势有一种特别棘手的形式——事实上是辩证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体的客观形式本身被转化为一种过程，一种流动”。(181)这种“流动”不是柏格森式的“持续时间”(dur<s: 2> .; e)，根据Lu*kács的说法,这仅仅是“空洞的”,而是对“(社会)*关系的不间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追踪。(181)当然，紧张之处在于，这种对(物化的)“事实”的消解很容易被视为脱离现实的单纯思辨，这往往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形式所采取的辩证法的方式。Lukács承认，这是一种“现实性理论，它给总体发展的主流趋势赋予了比经验世界的事实更高的地位”。(183)。正是“事实”的直接性是它们物化的标志，相反，这种趋势将现实回归到它的中介，回*归到复*杂的总体，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地记录下来，并因此得到“经验的”证实。因此，这种倾向的方法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

因为它必然脱离“事实”，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并被革命实践证实了，它才能成功。
当然，我对当代启示录基调的简要概述表明，Lukács根本不是关键的参考点。如果说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源于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契约的瓦解，以及为应对企业利润下降而转向金融化，那么发现当代的末世基调也根源于那一刻，或许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当代后自主主义思想的例子都是从内格里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融合而来的。他们特别借鉴了内格里、德勒兹和瓜塔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趋势概念的重新想象。我并不是在暗示资本主义基础和理论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同构;毕竟，这种趋势的重新工具化，正是试图阐明一种理论手段，以掌握经济“基础”的精确效果。然而，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理论看作是一个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式毫无关系的封闭的领域。事实上，正如将会变得清晰的那样，这是一个理论对福特主义危机的反应和回应的时刻。

在内格里的案例中，他在1971年的著作《计划国家的危机》中给出了他对趋势方法的权威陈述。在这一点上，内格里仍然保持着非常经典和辩证的术语，他认为:“趋势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预测，由发展构成它的因素的物质辩证法指定。”[9]内格里以类似Lukács的方式将这种趋势与工人的观点联系起来，并强调:

> 这种趋势的过程远不是僵化的或确定的。相反，它代表了理性在面对现实的复杂性时的一种冒险，一种*准备接受风险的理性的冒险*:事实上，这种趋势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验证

正如在Lukács中一样，这种倾向在这里被有意地置于背离“事实”的必要性之间;它是“理性的冒险”，但也是通过革命验证的机制回归到一个重新排序的新世界。

内格里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方法的实践是基于对福特主义社会契约危机的接受和激进化，以许可资本主义关系的迫在眉睫和内在启示的思想。如果资本主义开始破坏工厂的结构和有保障的就业，那么人们不应该为此感到遗憾，也不应该倒退到一些失落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而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推向出走、破坏和破坏福特主义残余的“羁绊”。这是斗争加速主义的一种形式。

他的作品反映了福特主义及其“计划国家”的危机，其含义是共产主义已经到来，只需要实现。内格里显然是“准备接受风险”，无情的人可以说，他自己对这种趋势的解读，随着自主性运动的失败和内格里的入狱，成为了验证失败的牺牲品。然而，这一失败并没有导致他在工作中对轨迹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细微调整。在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中，内格里将“与现实的复杂性相遇”换成了“理性的冒险”，在这种冒险中，这种倾向进一步被平化为共产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和积极性

倾向的偏差

在一个不太可能同床的例子中，阿兰·巴迪欧在他1982年的*作品*《*主体理论*》中也求助于趋势的方法:

> 对于轨迹的逻辑，我们反对的是结构辩证法所反对的，而轨迹的逻辑只有在它的*场景场景*的追溯操作中才宣布新的东西

> 趋势、潮流、先锋队的逻辑，在这些逻辑中，那些刚刚诞生的东西，虽然被放置和服从，却与未来最可怕的力量联系在一起

巴迪欧对“趋势逻辑”和准结构主义“轨迹逻辑”之间的对比的呈现，令人惊讶地以Lukácsian的方式表达——考虑到他们通常不被视为相容的人物。巴迪欧关于在轨迹的逻辑中“时间被空间消灭”(108)的评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Lukács的引用。

巴迪欧指出了一种倾向逻辑内在的偏差，这是“动力主义者”所实践的，他们“假定……可变强度的多样性”和“相信不可解决的趋势”。(209)这些思想家，以及巴迪欧显然想到了德勒兹和瓜塔里，都强调流动倾向高于任何客观时刻。在巴迪欧精彩的诊断中:“飞行的渐近视角使经验主义者成为流浪的唯物主义者，成为自然实体的流浪哲学家。”对镜子的无知使经验主义者变成了世界的镜子。(209)巴迪欧的论点是，在他们急于脱离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资本逻辑的“静态”或物化形式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动力学家最终*反映*了资本的积累和加速逻辑。

通过这种方式，巴迪欧对加速主义进行了批判，作为一种“流浪”的方法，它试图加速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决裂，同时又陷入其中。加速主义相信一种与“不溶倾向”的可能融合，以产生一种新的内在断裂。巴迪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轨迹逻辑和趋势逻辑之间迂回，这样它们才能相互纠正。那些强调轨迹的静态逻辑和对世界如实地耐心分析的必要性的人，阻止了我们急于修正我们的方法，从而使其脱离现实。与此同时，动力学家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感觉，即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冒险，不能简单地遵循现实的轮廓。

尽管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巴迪欧的建议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来“平衡”那些悲观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一个包罗一切的资本主义总是把人们分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位置(正如我们在阿尔都塞，阿多诺，以及当代价值形式理论家，如莫伊什·波斯通)，以及那些总是强调“抵抗是第一位的”和一个流动和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乐观分析(确切地说，内格里、德勒兹和瓜塔里，甚至雅克·朗西里的某些时刻)。

巴迪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评，以及他建议我们实践一种不包含“逃跑”观点的倾向方法，使得他后来强烈拒绝内格里自己的加速主义变体，这并不奇怪:

> 众所周知，对于斯宾诺莎主义者内格里来说，历史的实体只有一种，因此资本主义帝国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部署的场景。这当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人们信仰情况越糟越好;或者让你(错误地)把那些示威游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权势的人重新联合起来，就毫无结果地召集起来——当作新的小资产阶级无产者的“创造”和“多种形式的发明”

巴迪欧注意到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内格里把这种趋势看作是理性和现实在一个斯宾诺莎的“历史实体”中的*直接*融合。丢失的是趋势的任何细微差别，任何被矛盾、紧张和逆转撕裂的趋势的真实感觉。这样解读这种趋势的含义是，危机不会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计划的合理性所控制，而是会被新形式的逃跑和流动加剧——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也许内格里对资本的“镜像”是致命的，最好的迹象是他不断强调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成功的*。内格里认为，20世纪70年代革命冲动的恢复并不是一种

失败的标志，而是潜伏在腐朽的资本外壳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成功。只要再努力一次，资本的枷锁就会被挣脱，共产主义的内涵就会释放出来。在任何危机开始时，这一永恒的口号都会渐强。相比之下，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失败导致了“资本共产主义”，这在我看来是正确的;而不是超级资本主义导致共产主义，相反，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恢复和重新部署了共产主义元素(废除雇佣劳动，消灭国家和个人独特性的价值)相比之下，内格里神奇地将失败转化为胜利。

《穿越黑暗的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kly

当然，批评内格里的大众理论是“资本的镜子”并不是特别新颖。我所关心的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启示录与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启示录之间可能存在的混淆。相反，另一种更重要的讽刺在这种末日加速主义中起着作用。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最近通过回归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趋势*极限*的推测，提出了这种趋势的更经典的形式。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的论点，并没有那么多地表明资本主义被其自身的积累限制所注定，而是表明这个障碍应该被资本主义的激进化的去地域性趋势所打破。相反，巴拉克里希南回到了马克思的障碍隐喻的隐含意义，即资本主义实际上“破坏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15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加速”，特别是其新控制论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并没有表明某种“令人振奋的新文化状况”，而是“[c]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世界历史动力的表象，掩盖和抵消了‘实体经济’的长期减速。”’ 16

当代的加速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减速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存在脱节，甚至是反转。加速主义的“镜子”，正如马克思(1845)将意识形态比喻为*暗箱*的著名比喻，实际上是“历史生活过程”的“颠倒”形象。虽然声称追踪趋势，但加速论者的分析把表象当作现实，或者用更精确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只能抓住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真正抽象”。虽然这些“真实的抽象”确实是真实的，它们塑造并决定了价值的形式，但它们缺乏加速论者所发现的动力，而这些形式必然要投射出来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资本作为一种去疆域化的公理化机器或病毒的分析，既引起了共鸣，又引发了问题。

巴拉克里希南对所谓的技术和经济成就进行了有趣的严厉批评，这些成就可能被认为为这些投机飞行提供了物质实体:

>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创新推动了娱乐和社交活动的转变，扩大了折扣和奢侈品购物，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被称为“金融技术”的英雄时代。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沃尔玛和普拉达，布莱克-斯科尔斯和次贷——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技术地标

当然，巴拉克里希南指出了一种倾向加速主义的危险，这种加速主义将资本的特定预测趋势，甚至是资本的幻想自我形象视为现实。当然，当代加速主义的部分“动力”就是以“*真正*的加速力量”的名义克服这种惯性。
正是这一事实，解释了加速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双曲的神韵。与“沃尔玛和普拉达，布莱克-斯科尔斯和次贷”相比，它重申了科技和人类力量发展的“不可解决趋势”的承诺。这些力量是

融合在“认知者”的概念中，“新”认知和情感工作者将人类和技术的能力融合在一个内在的矩阵中。我主张的不是这种融合，而是从这种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动态形象中必要地脱离出来。这种趋势的方法需要修正，更密切地描绘当代劳动和斗争模式的形式和力量，而不是一种最终揭示力量的启示录断言(“启示录”一词的希腊语含义是“揭开面纱”)。启示录加速主义推翻了T.S.艾略特的断言，即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终结，而是在一声呜咽中终结。然而，承诺的大爆炸并没有以完全正确的形式实现。

6
终端加速

> 当我谈到狗屎的时候，它几乎不是一个隐喻: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成了狗屎，它说的是一种无差别的、被解码的流的状态，每个人都必须以一种私人的模式，带着一种罪责感，参与其中。
> flix Guattari1

事情都是狗屎。然而，终端加速主义将这种屎视为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的“滋养分解”;2，作为突破失败资本主义的贫瘠，跃进新未来的机会。我想分析，或肛门/yse，这种“排泄的愿景”作为当代加速主义的标志性形式之一。与德勒兹、瓜塔里或内格里等思想家的不懈积极不同，这里加速的路径在于资本主义的消极性和虚无主义。我们已经看到，让·鲍德里亚是这种形式的关键人物之一，但我想回到更早的两个时刻，来追踪消极和启示录的趋同。这些是20世纪30年代乔治·巴塔耶和让-吕克·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周末》的作品*。如果汽车是现代主义速度的典范，*那么戈达尔的《周末》*(Weekend)就是这种模式的终点，它那著名的、持续超过8分钟的交通堵塞跟踪镜头。这部电影也有一个标题“在垃圾堆上发现的电影”，我们可以把它重新表述为“在垃圾堆上发现的电影”，考虑到它的舞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粪便启示录。

戈达尔的电影明显提到了乔治·巴塔耶。“肛/眼”这个意象出现在科琳的独白之前——一个幻想，或者噩梦，或者现实——它描述了刻意模仿巴塔耶1928年小说*《眼睛的故事》中的*肛性爱场景

(这也成为了维基百科对这部电影的文化参考)。我们还可以添加更深奥的参考，“艾米丽Brönte”作为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出现，巴塔耶的《*文学与邪恶*》(1957)中的一个“案例研究”就是专门研究她的作品的。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戈达尔发展了巴塔耶的“异质”观点，巴塔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阐述了这一观点，即“排泄力的破坏”使价值消失在巴塔耶的粪便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从“无产者的唯物主义内脏”中爆发(35)，而阶级斗争，对巴塔耶和戈达尔来说，是一种粪便般的启示，一切都变成了屎。
这种屎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和逆转的场所:从危机和浪费的肛门资本主义到一场将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产生的“有限”废物的革命，而资本主义产生的废物总是服从于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加速主义可以将生产力的启示录可能性和毁灭的启示录可能性编织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危机像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那样，通过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来运作，那么这种形式的终极加速主义旨在超越资本主义本身。

在泥潭中沉沦

在1929年的一篇题为《花的语言》的文章中，巴塔耶写道，不幸的是，这是杜撰的

>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令人不安的举动，他和疯子关在一起，这些疯子把最美丽的玫瑰送到他面前，只是为了摘下花瓣，把它们扔进装满液体肥料的沟里——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有压倒性的影响吗?(14)

萨德的姿态对巴塔耶的影响是，它证实了他对“基础唯物主义”的召唤，即回归到虚无的美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巴塔耶会责备

尼采“完全不能在泥里打滚”(39)。与尼采试图建构超人(bermensch)的可能性不同，巴塔耶的愿景是“下层人”:将“人”拖入粪便中。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巴塔耶发展了他后来称为“一般经济”的东西，这种经济“建立”在排泄物中，反常的，以及所有不能与效用协调的元素，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限制经济。我不认为他在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后资本主义陷入全球萧条的同时发展了这一理论是巧合。这种“异质论”起到了“泄殖腔”批判的作用，针对的是价值积累和劳动的稳定。巴塔耶的唯物主义不仅打破了稳定经济的形象，也打破了稳定物质的形象。因为巴塔耶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简单地把物质的位置从下向上颠倒而把物质变成了一个“死的上帝”。与此相反，巴塔耶认为，“老年唯心主义”的瓦解要求我们将物质视为不稳定的、活跃的和过度的(15)。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拖入泥潭。

当然，正如Jean-Joseph Goux所指出的那样，巴塔耶的过度经济可能对致力于积累的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禁欲主义有牵拉作用，但它似乎与“后现代”过度资本主义有一种奇怪的一致性甚至巴塔耶与华尔街大崩盘的接近也表明了这种模糊性，因为资本主义进入了自身的空虚和价值破坏，只有在破坏性的战争经济中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读一下唐·辛普森的人生故事——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制作了所谓的“高概念”电影，如《比佛利*山庄警察*》*(1984)*和《壮志凌云》(1986)——我们就会明白，一种越界的世界观是如何符合资本主义自由和过度的幻想自我形象的辛普森的惩罚制度过度-从毒品和妓女，到锻炼和整形手术-使他致力于身体的物质性，使自己成为“完美的”资本主义主体。我们也可以转向更日常的事实，即那些被资本主义抛弃的人，作为“盈余”

从字面上看，“人类”常常生活在屎中而不是粪便和反常的设置一些替代空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它成为编码在其中，作为其固有的和许可的越界，因此重新连接到价值生产，但在“纯粹的”投机和过剩的水平。所谓的“健全投资”可以变成粪便，但粪便或废物也可以突然成为一种投机资源。

巴塔耶批判的僵局不仅在于它已经被一种“地方性”资本主义所超越，一种靠过度和浪费而繁荣的资本主义。更具破坏性的问题是，它把这种过剩或浪费设想为一种新生产的场所，这种生产似乎很难与资本主义决裂。这是一种倒置的或消极的生产主义，它将破坏加速到“更高”的太阳能过剩水平——一种终极加速。这种生产主义使得我们很难看到如何像鲍德里亚所希望的那样，利用巴塔耶来粉碎“生产的镜子”。巴塔耶是模棱两可的。虽然他确实可以被解读为歌颂一种新的生产形式，但他的作品也暗示了生产内部的危机。与其说巴塔耶提出了另一种浪费原则，不如说他从内部破坏了生产，侵蚀或削弱了生产能力。他对“腐烂的太阳”这个形象的使用暗示了这种对太阳能过剩的模棱两可的破坏，通过将过剩拖入腐烂的基础物质(57-58)。巴塔耶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把上升和突然下降结合起来考虑。

巴塔耶沿着粪便飞行的路线表明，试图找到对加速主义和生产动力学的绝对阻力是困难的。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废物的原则，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原则被逆转为“滋养分解”。巴塔耶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完全解决传统意义上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存在于任何“生产性”话语或实践中的可逆时刻。在这个时刻，消极和积极可以突然地、灾难性地转移位置。然而，从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动力”中提取这种可能性的困难仍然存在。

野蛮还是野蛮?

戈达尔的《*周末*》讲述了一对资产阶级夫妇罗兰和科琳开车去科琳的父亲那里领取遗产的故事。两人都有秘密情人，两人都在密谋谋杀对方，如果有必要，两人都很乐意谋杀科琳娜的父亲，以获得遗产。随着他们周围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他们在法国的旅程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这里的排泄物是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末日危机。戈达尔以讽刺的形式将这场危机描绘成食人族革命者——“塞纳河之声解放阵线”(Seine-et-Oise Liberation Front, FLSO)——他们主导了影片的结尾镜头。身着模仿美国原住民服装的准嬉皮士革命者，FLSO提供了一种吞咽隐喻的字面化，与其说是在挖掘资产阶级世界的坟墓，不如说是在消耗和排泄它。

事实上，正如戈达尔的电影所记录的那样，这种“排泄物的视觉”是分裂的:我们有巴塔耶的革命分析性，在那里，异种的力量打开了现实的再幻想和再再现，但也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性，在“创造性破坏”中消化和空虚的循环。戈达尔明确地再现了我们在《巴塔耶》中注意到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革命和创造性破坏交织在一起，并以新的破坏性消费形式融合在一起。事实上，食人者既是不可救药的极端形象，*又是*自我消费资本的形象。

诺曼·o·布朗(Norman O. Brown)在他*对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解读中分析了这种分裂的观点，现在这一观点受到了争议。对布朗来说，斯威夫特的“粪便视觉”揭示了文化和精神的无性。用布朗的话来说，“对斯威夫特来说(粪便意象)……成为他攻击人类的自负、骄傲，甚至自尊的决定性武器。”’ 9然而，斯威夫特对破坏人类尊严的排泄物核心的揭露，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肛门经济的历史揭露。伊莱·扎雷茨基(Eli Zaretsky)指出:“布朗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源是社会组织的肛门性:在伪个体化的生殖器之下。

早期现代社会，其驱动力实际上是对狗屎的热爱。”卡娅·西尔弗曼和哈伦·法罗基讨论戈达尔的《*周末*》一章题为“肛门资本主义”。[11]

如果排泄物在神圣的标志之下，那么它显示了神圣的典型模棱两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最终的回归还是重生?如果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对屎的爱”，那么这种“驱动力”就恰当地体现在汽车的模棱两可的地位上，在《*周末*》中，汽车既是“珍贵的商品”，又是“毫无价值的垃圾”。[12]从生产中“周末”的中断导致了停滞的异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产被逆转为空虚;交通堵塞则是这种动力的堵塞，是失败流动的难以消化的时刻，是排泄物的堆积。正如布赖恩·亨德森(Brian He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著名的交通堵塞长镜头在《*英国之音*》(British *Sounds*, 1970)中汽车生产线的跟踪镜头中找到了未来的回声戈达尔再次发挥了生产与破坏，生产与反生产，价值与浪费的颠倒作用。正如巴塔耶对他的不稳定思想所做的那样，他注入了一种振荡，进入了粪便活力论的视野。

资本主义的“驱动力”的模糊——巴塔耶所描绘的这种结合、消化和排泄的肛门经济是否可以脱离轨道，进入一种狂喜和启示录式的空虚——在粪便启示录的时刻被加倍了。我们对一个正在分解的文化的浪费问题含糊其辞。是戈达尔为我们提供了“滋养的分解”，还是我们只是陷在垃圾堆里?用斯威夫特的话说，我们会发现“从粪堆里长出来的艳丽郁金香”吗?《[14] *Weekend*》暗示的是，我们不再有社会主义或野蛮，而是*野蛮本身*;但正是这种野蛮，似乎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认为:“有人认为，在这种‘文明’的薄薄的外表下，跳动着一种更有情感活力的‘野蛮’的心脏。”[15]对于戈达尔的“革命者”来说，“*我们只能通过更大的恐怖来克服资产阶级的恐怖。*”[16]这很可能是“终极加速主义”(terminal accelerationism)的座右铭——*avant la* letter。

《周末》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最后的危机中出现了一种排泄物的生机主义，这也是它在当下引起共鸣的原因。在巴塔耶的表述中，“令人不快的终极停滞”的揭示摧毁了“工业现实的声望”。[17]这是一种承诺，正如罗宾·伍德所说，“*周末*不是关于世界的终结——它只是关于*我们*世界的终结。”[18]在一段相当感人的评论中，伍德继续说道:“这部电影相当令人信服地假设了我一直相信的、为之奋斗的、发现值得为之活着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无用的和最终的解体，我认为我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是独特的，甚至不寻常的。”’[19]《启示录》仅限于资产阶级世界的终结，以及从粪堆中重生的新的重要秩序。

充满生机的野蛮的恐怖预示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新未来。这与19世纪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阅读了理查德·杰弗瑞的末世小说*《伦敦之后》(1885)后*所说的话不约而同:

> 对于“文明”的未来历史，我没有比一粒芥菜籽更大的信心，我现在*知道*它注定要毁灭，而且很可能很快就会毁灭:想到这一点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想到野蛮再一次充斥世界，真正的感情和激情，无论多么简陋，取代了我们可怜的伪善，我感到多么欣慰

野蛮就是重生。困难在于，戈达尔把“新世界”描绘成一个停滞和漂流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感情和激情”的世界。食人族革命者大吃大喝着旧秩序的残余物，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过着几乎没有激情的生活。
虽然承诺一个世界将在恐怖中结束，诞生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新世界，大概没有恐怖，但在戈达尔的电影中，恐怖似乎不太可能和平地消失。虽然*《周末》*正好出现在

1968年5月的事件，将重新激发“对真实的激情”，在戈达尔的电影中，这种革命的激情以食人族灭绝的最终形式出现。他的食人族革命者是被研究过的嬉皮士原始主义者，他们打鼓，强奸他们的俘虏，厨师穿着沾满血迹的围裙为他们提供食物。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在革命的“对真实的激情”中，唯意志论生机论与历史确证论之间的辩证法通过一种回归而破裂。在这种回归中，“活力”脱离了历史，将历史粉碎成一个社会零度和自动消费的神话空间。

如果资本主义*都*是狗屎，如果我们有一个“肛门资本主义”，把所有的东西都平化为一般的等价，那么在最后的虚空中，一切都需要结束。在某种“未来”之前，需要启示录的语气，完全分解以消耗腐烂的文化。正如西尔弗曼指出的那样，戈达尔“对所有形式的抽象发起了广泛的攻击”。[21]随着抽象——它本身通过价值来实现平衡和等价的组织——的消失，我们得到的似乎是绝对野蛮的另一种抽象。这种对抽象的消解与平均化，有了它自己的报复，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或精疲力竭，让电影再次变成了屎。这些标志再次模棱两可，肛门的“解放”，“排泄力”的“解放”，再次引用西尔弗曼的话，“不是霍昆赫姆30年前欢呼的乌托邦式的性解放，而是所有奇点的灾难性终结。”我们可以称之为“肛门资本主义”的东西，规定了“男性”和“女性”的可通约性，但只是把两者连同《*周末*》本身一起，扔进了宇宙的垃圾堆。[22]《天启》揭示的并不是另一种革命秩序，这部电影作为通往1968年5月的大门，将其嬉皮食人族革命者救赎为力比多反抗的“好嬉皮士”，但在资本主义秩序在危机中被剥夺的时刻再次观看，似乎也揭示了资本本身的终极平衡。

讽刺的含糊其辞是否必须以充分的政治化来逃避讽刺与客体之间无情的反转辩证法?戈达尔的*周末*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之前的集体实验政治电影制作的Dziga-Vertov

组。写于1973年，托马斯·m·卡瓦纳认为，戈达尔转向明确的政治和说教电影，是对资产阶级崇拜《周末》这一事实的唯一可能回应。23*《周末》*在商业和评论界的成功，将导致戈达尔转向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明确的政治电影制作的紧缩和集体实践。

休养生息和重新消化;肛门生物政治经济àla帕索里尼的电影*《萨罗》*(1975)在召唤。无法复原的“异体”成为*欢爽的对象*，成为回归到资产阶级自恋的自我厌恶的对象。革命本身是循环的:“甚至有一个熟悉的暗示，在电影中具体地表现为他们仪式的相似和相似之处——女孩大腿间的鸡蛋和鱼——革命社会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凶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另一种形式。戈达尔摆脱这种消费循环的方法是一种难以消化的政治紧缩，他觉得这种紧缩不能被利用。

然而，戈达尔的政治确定性和他的批评者的政治确定性的崩溃，将*《周末》*的讽刺或模仿重新定位在我们这个时代:危机的*周末*，泡沫的破裂，放弃房子和汽车作为负债累累的“敌对对象”。排泄物或同类相食的敌意现在塑造了正在腐烂的资本主义文化。戈达尔电影的僵局是通过政治实践来挽救的，但资本主义和这种实践的分解使得*《周末》*的“平衡”，如果不是“彻底有趣”，至少是必要的。这样看来，它是消极加速主义的终极文件。它同时是最极端的讽刺形式，但又转向抽象的空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7
紧急刹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反思当代，评论道:

> 我们也许会停下来观察一下，今天如此多的左翼政治——与马克思自己对流线型技术未来的热情承诺不同——似乎采用了本雅明的奇怪观点，即革命意味着在失控的历史列车上拉下紧急刹车。就好像一个公认的失控的资本主义本身垄断了变革和未来

鉴于加速主义的持续和复苏，詹姆逊对当代左派的描述是可疑的。加速并没有消失，詹姆逊自己的重新调整的生产主义是“对精简技术未来的热情承诺”的一部分，这种承诺在我们的危机时刻持续存在，甚至还在增加。

我想在詹姆逊提到沃尔特·本雅明的“奇怪想法”时暂停一下，他认为革命可能是一种减速、中断或停止“历史的失控列车”的行为。这显然是对加速主义的一种反驳。参考资料是本雅明1940年的论文《历史的概念》的注释，他写道:“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革命是这列火车上的乘客——也就是人类——启动紧急刹车的一种尝试。[2]显然，对詹姆逊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因为它没有达到马克思自己的标准

拥抱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作为革命变革的条件。

本雅明的“古怪想法”有明确的背景。这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历史概念”的论文十一中，本雅明指责它“随波逐流”。社会民主主义与进步和加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一致性，意味着它无法掌握法西斯主义的动态，也无法有效地批评资本主义。除了这一历史论点之外，我想提出，本雅明的“古怪想法”在当时和现在都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到本雅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与加速和生产的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他与Bertolt布莱希特的对话中。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在20世纪20年代末相遇后，就如何使资本主义生产“重新运转”(Umfunktionierung)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下——1917年后革命浪潮的失败，德国的通货膨胀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布莱希特/本雅明的辩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共鸣。对魏玛(Weimar)、1929年大萧条(1929 Crash)的追述，以及对法西斯主义或战争初期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对危机的评论中熟悉的比喻。这是一种相当投机的联系，但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提供了资源来中断陷入危机和破坏的资本主义。

《超越资本主义的死尸》

格肖姆·肖勒姆认为，布莱希特进入本雅明的生活，在1999年1928年，被称为“自然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解读为布莱希特对生产再造的坚持。当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初认识布莱希特时，布莱希特正在阐述他对文化和政治生产的批判实践，以应对资本的危机和破坏性影响
1929年和德国通货膨胀的经验。

一个关键的陈述是布莱希特的诗“无产阶级不是出生在白色背心”[Das*无产阶级之夜在einer weissen西部geboren]*(1934)。这首诗呈现了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衰落，最后得出结论:“哦，在那一天，无产阶级将能够接管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被降低到它发现生产的同一状态:废墟。”’ 6无产者不是‘干净的’现代主义新人，而是愿意亲手弄脏自己的手。这是唯一能够把握和解决资本主义“肮脏”废墟的阶级。阿兰·巴迪欧认为，布莱希特的诗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主题上的:“新的东西只有在废墟中才会出现。”新奇只会发生在完全完成的毁灭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虽然完成了摧毁资本主义的工作，但却是为新的共产主义生产服务，弄脏了自己。资本的毁灭就是巴迪欧所说的“滋养性分解”。8

布莱希特建议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的废墟，这可以采取挑衅的形式。像苏联先锋派一样，布莱希特并不害怕与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因素接触:

> 行为主义是一种心理学，它从商品生产的需要出发，以便发展影响购买者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进步的和革命的阴极*(Kathoxen)*。与其资本主义功能相一致，它也有其局限性(反射是生物性的;只有在卓别林的几部电影中，它们已经具有社会性)。在这里，这条路也只通向资本主义的死尸，但在这里，这也是一条好路

布莱希特的“重新运作”开启了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极端形式，作为在“资本主义的尸体”上找到“好道路”的手段。我们必须穿越本雅明所说的“当下肮脏的尿布”。10再一次，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资本产生的“污垢”或废物，而且，正如我们在终端加速主义中看到的那样，挖掘这些污垢以产生新事物的需要。

在他的《与布莱希特的对话》中，本雅明提到了“布莱希特性格中破坏性的一面，它几乎在一切还没有实现之前就把它置于危险之中。”布莱希特是本雅明论文《破坏性性格》(1931)的原型之一，这在现在看来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布莱希特的“破坏性性格”激发了本雅明对破坏和生产的思考。虽然本雅明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一份毁灭的宣言，但它也是一份重新装备或重新运作生产的宣言。《破坏性性格》通过破坏来为新事物扫清道路。然而，这一生产时刻是以中断为前提的。在本章中，我想追溯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这种中断思想，将其作为任何诉诸加速主义的复杂因素。

懒汉

欧文·沃尔法斯(Irving Wohlfarth)曾指出，本雅明的破坏性性格是“驱逐令的有效执行者”。[13]什么样的驱逐令?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张由一个懒汉执行的驱逐令。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8年关于布莱希特的书中，他提出了生产和实践的布莱希特能量，以对抗我们不透明和金融化的后现代主义的停滞。在反思布莱希特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作品*《巴尔》*(1918)时，詹姆逊将巴尔这个角色与懒汉的形象联系起来:

> 这些是文学中的懒汉，而不是它的僵尸或活死人:身体上和精神上被忽视的生物，森林之神，肮脏的老人，诸如此类，他们是欲望的原型，从流行文化中涌现出来(而不是像至高无上的恶棍和邪恶的表现一样，从文字中涌现出来)

这个数字是破坏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如詹姆逊所说，他们“爆发并打破家具”。詹姆逊指出:“在早期的作品中，布莱希特对体面的厌恶总体上得到了丰富的记录——*巴尔*是其虚拟的寓言: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是。

因此，能够利用那些“反社会”的能量，与消极的事物进行新的、更有成效的接触。16因此，看似“纯粹的”破坏性的粗鄙并没有在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和生产的拥抱中简单地消失。事实上，懒汉作为中断的时刻，在生产的时刻内持续存在。

布莱希特的短篇小说《北海虾》大概写于1926年左右，副标题是“或现代包豪斯公寓”，是对懒汉被打断的寓言它讲述了米勒和叙述者访问他们的战时朋友坎珀特的公寓。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后，坎珀特致力于奢侈的生活，并与金钱结婚，实现了他的梦想。这套公寓现在是完美的包豪斯风格，而以前是两个普通的资产阶级房间。你知道那种东西，一开始很狭窄，然后和家具一起堆放在船舷上。79)

全紫丁香色的房间，精致的百叶窗，以及缺少图片，让叙述者，尤其是米勒，心烦意乱:

> 令m<e:1>勒恼火的是这套公寓。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这是一套非常舒适的公寓，一点也不铺张。但我想，mrs . ller只是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心设计的和谐和教条的功能主义了。(82)

尽管米勒带来了北海虾作为礼物，但他还是让坎珀特去买了一些，然后重新装修。他粗暴地重新整理家具，扯下百叶窗，用糖水把杂志图片贴在墙上。解说员总结道:“人就像一场可怕的龙卷风，从一大堆美国专利躺椅、普通的脸盆和古老的、值得尊敬的杂志中，创造出所有创造物中宏大的多样性和令人钦佩的不和谐。”(84)

这个短篇故事打乱了本雅明后来在“经验与贫穷”(1933)中对舍尔巴特和包豪斯玻璃建筑的引用，因为布莱希特要求“消除痕迹”。18创造“难以留下痕迹的房间”，19

这正是布莱希特的“破坏性的懒汉”所反对的，而米勒则“渴望一切最不匹配、最不合逻辑、最自然的东西”。(85)本雅明版本的破坏性角色抹去了那些想要舒适的人的痕迹，而布莱希特版本的破坏性懒汉则通过在事物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来让自己的空间变得舒适。m<s:1>勒的破坏性的“卑贱”，他的邋遢身份，打断了干净的现代主义空间。他积极地将新事物变成废墟，打断新事物，去创造一些并不完全具有生产力，而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东西。

《天使火车头》

我被打断的第二个场景来自沃尔特·本雅明1932年的一次儿童广播演讲，主题是“泰湾的铁路灾难”(Die *Eisenbahnkatastrophe om泰湾*”)。正如标题所示，这次演讲的中心主题是1879年12月28日的铁路灾难，当时一列载有6节车厢和200人的客运列车在经过的铁桥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倒塌后坠入泰河，失去了生命。本雅明并没有从灾难开始，而是从早期的炼铁和火车建造技术开始，在他关于爱德华·富克斯的文章中，他称之为“技术接受的缺陷”。本雅明在报告中指出，埃尔兰根医学院的观点认为，铁路旅行的速度会导致大脑损伤，而一位英国专家则认为，乘火车旅行不是旅行，而只是像包裹一样被运送到目的地。也许这两人都无法预见到目前英国的火车系统……

在描述这场灾难时，本雅明引用了西奥多·方檀的一首诗，而不是威廉·托帕兹·麦格的那首著名的诗，后者以可怕而闻名。这是《麦格教授》的第一节:

Beautiful Railway Bridge of the Silv’ry Tay!

唉!我很遗憾地说
90条生命被夺走了
1879年的最后一个安息日,
这将被记住很长一段时间

据本雅明报道，事故发生时，风暴非常猛烈，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唯一的迹象是渔民看到了火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火车头坠入水中的结果。他们确实通知了泰站的站长，站长派了另一辆火车头沿着线路行驶。火车慢慢地上了桥，在到达第一个中央码头之前，不得不在一公里外停下来，猛烈的刹车几乎导致火车从轨道上跳下来:“月光让他看到了铁轨上的一个大洞。桥的中心部分不见了。23

刹车是一个中断的形象，这为后来在《论历史的概念》中使用它做了铺垫。当一场灾难已经发生，两百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时，刹车的行为阻止了第二次灾难的发生，尽管只是勉强阻止。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火车头、速度和技术的恶性的考虑，与本雅明在《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的评论放在一起:

> 圣西门的门徒们用他们的工业诗歌开始了这一进程;然后是杜坎普的现实主义，他把火车头看作是未来的圣人;路德维希·普福(Ludwig Pfau)走在后面:“成为天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写道，“因为火车头比一对最好的翅膀更有价值。”24

这个冲向未来和毁灭的天使火车头，可以与本雅明在《历史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1940)中著名的“*Angelus* Novus”或“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相结合，后者转向过去，思考历史的残骸。

因此，“天使火车头”是加速的标志，表明技术发展超过其阈值的能量是破坏性的。[25]这里的要点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技术的现状，但技术的“重新运转”取决于资本主义加速的中断。本雅明在他的文章《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快照》(1929)中重申了这一点，他批评超现实主义者“过度拥抱未被理解的机器奇迹”。[26]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对加速主义思潮的一种回应。本雅明不仅与布莱希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且还与他自己早期为革命夺取生产力的愿望(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每分钟的革命数

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所采取的立场，有时可以被粗略地描述为加速主义者。我试图探究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也破坏和打断了加速主义者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幻想。我所建议的是，詹姆逊提出的“一个流线型的技术未来”作为革命性变革的关键的形象，正是他们所质疑的。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某种怀旧或田园式的愿景，而是一种拒绝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条件来对待它的断续性政治。相反，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关注的是生产力的破坏性，尤其是那些已经脱轨的生产力。

本雅明对毁灭的记录及其含糊其辞，恰恰表明了时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将在《论历史的概念》(1940)中得到阐述。同质的空时间是轨道上的火车的时间，它可以加速也可以减速。本雅明对革命的比喻中的紧急刹车，不仅仅是让一列火车在平稳的进步轨道上停下来。相反，与历史天使的比喻一样，它暗示着通往未来的火车轨道正在铺设中

就在火车的前方。事实上，泰桥灾难的轶事表明，紧急刹车的应用正是由于列车*脱轨*，并威胁着另一次灾难性的脱轨。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生产辩证法的破坏性一面，历史的“铁轨”就会加速我们走向灾难。

正如本雅明的笔记所表明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史的轨道上加速的愿望，在生产力面前滋生了被动:

> 27 .一旦无阶级社会被定义为一项无限的任务，可以说，空虚而同质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接待室，在这个接待室里，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平静地等待革命形势的出现

轨道延伸到未来的想法，使革命成为一个后退的时刻——一个我们从未完全到达的车站。结果，与革命的干预相反，它是火车的不断燃烧，即资本主义生产力。这是加速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它要么试图积极地提高资本的速度，要么干脆成为火车上的乘客，任由活劳动在死劳动的手中不断地毁灭，去做工作。

结论是，紧急刹车不仅仅是为了停车而停车，而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美国共和党右派现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恐怖)静态停车。它也不是回到某个乌托邦式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因为那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诅咒相抵触。相反，本雅明认为:“无阶级社会不是历史进步的最终目标，但它经常流产，最终[endlich]实现中断。”28我们中断是为了防止灾难，我们破坏轨道是为了防止加速带来的更大破坏。

紧急刹车是本雅明的非目的论暂时性政治的操纵者，其目的是将无阶级社会从持续的生产/破坏的辩证法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不断的“紧急状态”。[29]与其加速走向毁灭，我们必须将毁灭视为一种亲密的、持续的可能性。在布莱希特的邋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针对干净的新事物的反杂工破坏。在这里，我们以“不合逻辑”的方式重新排列和拆解新事物。本雅明的中断暗示了以生产为目的的更明确的中断(或刹车)。天使火车头的停止试图跳过历史的轨道，或者跳出历史作为无限等待革命形势的愿景。

不可避免地，这种跳跃的轨迹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在生产之外没有简单的方法，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中断加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新的东西。相反，我们可以把生产看作是一种中断，看作是一系列“经常流产”的实验。这并不能阻止“最终(endlich)实现的中断”，而这将是新事物的真实状况。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中断思维是一种干预思维，它不仅阻止了加速，而且重新思考了生产和“生产力”这个概念本身。紧急刹车难以实施，并不意味着中断应该被抛弃。

结语:移动的矛盾

> 共产主义并不激进。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列宁曾将“左翼共产主义”——激进地拒绝议会选举和工会作为斗争场所——描述为“婴儿症”。我将当代加速主义描述为“研究生症候群”。这不仅仅是指当代加速主义者的主观立场，也不是单纯的骂人或人身攻击的论证。我指的是研究生在就业市场边缘或尖端的具体位置。研究生通常拥有重要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在相当晚的时候才面临全面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当然，在英国和美国，学生的资助已经迫使他们进入债务奴役的未来生活。此外，许多人都在工作，试图出人头地，或者更常见的是，勉强维持生计。也就是说，这只会增加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力世界被视为一个未来的恐怖世界——无尽而琐碎。加速主义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将工作的恐怖转化为机械沉浸的欢爽。我们可能会面对一种劳动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试着“kein Schmerz, kein Gedanke”地面对它——不带感情，不带思想。

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幻想，把工作作为重复性力比多加速的场所，在那里，资产阶级的自我被淹没在非人劳动的冰冷的水中。虽然非常容易被批评，但这样的愿景承认了当代资本分解的真相。特别是，它是资本主义下作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未来的崩溃，加速主义用一种替代来回答这个问题

未来在它的位置:重组复古70年代的未来主义与资本主义“活力”的磨损残余相结合。
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呢?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考虑一下当前对加速主义刹车的尝试，以及当代对加速主义的重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追踪，我想建议，加速主义的穿越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拒绝或发现一些(不)快乐的中间值。我们必须挖掘和抵制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加速主义所模仿的欲望的刺激——沉浸在加速的真实力量中的幻想。

据说很有趣的事情

对我们当下的少数零星的反加速主义批评，似乎往往没有触及加速主义的性欲核心。这些替代方案似乎不冷不热，甚至是反动的——比如佛朗哥·“比佛”·贝拉尔迪(Franco ' Bifo ' Berardi)对疲惫政治的呼吁，这种政治将“成为一场缓慢运动的开端，走向‘无为’文明，基于退缩，以及对生活和消费的节俭期望”。[2]这种后现代的道教几乎没有魅力，它对牺牲和逃避的期待似乎在嘲笑那些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买单的人。“节俭的期望”是我们许多人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样的承诺很难与加速和过度的提议竞争。出于这个原因，加速主义获得了对这种惯常政治道德主义的重复感到不安的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给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减速政治版本，部分基于古巴从其国家(最后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形式之一)缓慢滑向几乎肯定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这种奇怪的中断或过渡中，布伦南瞥见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社会主义的乐趣将是“慢节奏的乐趣”。特别是，布伦南愿意思考这个问题

以另一种秩序来面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刺激:

> 商品的相对缺乏——乍一看是反对快乐的——实际上会允许一种不那么极端的劳动分工，将人们从虚幻的“选择”和广告的精神负荷中解放出来，以及从事物的暴政中获得更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自由

快乐是被重新配置的，而不是被抛弃到穷奢极欲中去。它被重新配置为另一种选择模式，而不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提供和要求的“选择”的强制行使。这种对快乐的重新配置是任何反加速主义计划的关键要素。

最近对加速主义的重申明显是在持续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明显停滞以及新自由主义2.0的结构性(错误)调整的背景下进行的。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尼切克的工作最明确地试图为我们这个时代重振和重新装备加速主义。他们通过重塑尼克·兰德90年代的愿景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将速度与加速度分开。威廉姆斯和斯尼切克认为，一方面，对速度的认可是“传统”加速主义的失败。这种认可仍然在资本主义的参数范围内——它是一种“逻辑加速”，提供了一种“根本不需要大脑的速度增长”，[5]甚至是“一种简单的脑死亡冲击”。[6]相反，他们认为“加速也是一种导航，一种在普遍可能性空间中发现的实验过程”。我们可以说一种加速主义对加速主义的批判……
虽然这是对兰迪亚过度行为的有益纠正，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概念和政治问题。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讨论了高频交易(HFT)，在这种交易中，新的计算机算法工具将交易推到了人类感知的极限之下，并达到了物理学的极限，但他们无法认可

高频交易(hft)相反，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相当不舒服的位置，HFT被视为一种新的极端:

> 在人类仍然过于缓慢、过于肉质、无法超越某些时间、感知和数量障碍的地方，HFT系统迅速发展，产生了现代金融市场的精细纳米级结构，过于复杂，肉眼无法观察

然而，他们坚持认为，这些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愚蠢的，无法打开一个新的概念空间的可能性。HFT系统*显然没有*体现新的加速，但仍然是哑速操作。

这使得他们的加速主义，不像兰德对资本主义进程的明确认可，是没有根据的。加速的其他可能性只在后革命的空间中开放，这是我们以一种更传统的方式得到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紧张动力没有计算出整个系统的破裂。[9]因此，我们有革命作为资本和劳动的移动矛盾的结果，然后加速。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清楚为什么开放一个可能性空间必然需要加速，这意味着前进的势头和现有可能性的推进?阿多诺评论说:“也许真正的社会会厌倦发展，出于自由，将可能性搁置不动，而不是在一种迷惑的强迫下猛攻去征服陌生的星星。”[10]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的终结将涉及新的可能性的放松，但这种加速主义2.0能否完全重新配置资本主义的限制或参数，这并非不言而喻。在对太空计划和其他形式的技术热潮的怀念中，它走的是与速度加速主义相同的道路。虽然威廉姆斯宣称要推动一个“*更现代*的未来——一个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无法产生的另一种未来”，[11]但这似乎和兰德的愿景一样，仍然在现代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在反加速主义者和加速主义者之间找到的是一种奇怪的怀旧情结——对社会主义减速的消失可能性的怀旧，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最终滑向，与资本主义的怀旧相比，资本主义的怀旧只能用过去的加速梦想来填补我们缺席的未来。这尤其对加速主义来说是一种痛苦的讽刺，因为它在未来主义上押下了如此大的赌注。怀旧是一种对力量的怀旧——一种对某种东西、任何东西的渴望，以产生足够的能量和动力来打破当下的地平线。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力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单一的力，以解释不同可能的地点在一个内在的平面上的分散和联系。加速主义是建设性的，但这种建构在可能的未来的伪装下复制了过去。

《不可能的劳动》

如果加速主义指出劳动问题是资本的“移动矛盾”——既是价值的源泉，又是被机器挤出来的——那么它试图通过用机器炼金术化劳动来解决这个矛盾。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不可能快速进入未来委托给机器的劳动，也不可能回到劳动作为“诚实的日常工作”的“美好过去”。事实上，加速主义表明了劳动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不可能性*。这显然不是说劳动不发生，而是说劳动不能也没有履行资本主义所暗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验证的功能。资本主义随时准备放弃任何特定形式的劳动，或者在市场下降的情况下，这表明劳动不能承载它应该承载的意识形态重量。

弗朗哥·巴切西(Franco Barchiesi)在他对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工人的研究中，详细说明了工作一方面如何成为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如何不能允许真正的自我再生产医疗、保险、交通成本、房屋所有权等的私有化，留下了那些

“足够幸运”地在工作中无法生存。虽然劳动对公民身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想“福利骗子”、“福利骗子”等等(以及其他)的妖魔化，它也从来没有履行过这一功能。巴切西指出，在资本条件下的工作总是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为“不稳定者”保留的——那些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更明显的不稳定工作条件的人。巴切西的论点中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指出，对劳动的这种不稳定性或不可能性的揭示不仅会导致左翼政治活动，而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也可能导致反移民和反福利情绪。那些挣扎着以不稳定的工人身份生存的人，既可能开始新的支持和斗争形式，承认工作的不可能性，也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人。

我认为，这是当下最关键的难题之一。加速主义试图以机械的整合和灭绝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在沉浸的逻辑中绕过了意识、意识和挣扎的问题。我们被资本的移动矛盾撕裂成破碎的两半，无法重新组合在一起——既无法向前进入“流线型”的未来，也无法回到福特主义过去的“稳定”。对于这个矛盾，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我想建议的是，沿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形象的怀旧之路进行复制，并不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事实上，对劳动状态和劳动条件的斗争，即使是不可能的劳动，现在也必须进行斗争。

我的建议也许是最低限度的，承认这种矛盾是必要的第一步。这使我们回到“传统”问题，即我们如何干预和否定那些破坏和控制我们存在的劳动形式和力量。然而，拒绝工作的话语或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技术-力比多幻想并没有起作用。尤其缺乏的是在考虑可持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参与工作否定的机构和集体形式。我们遇到的资本主义有时是，

有时很乐意拒绝我们的工作，而在其他时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极端的要求。
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意地讽刺一下，就是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去解构。反对私有化和要求将私有化的服务归还给公共控制的运动，试图通过攻击我们认为工作是我们所有自我复制的原因的方式，来减少我们对工作的依赖。这些斗争与捍卫公共服务、保护福利、维持社会和集体形式的支持的斗争是平行的。虽然这些斗争可能并不引人注目，特别是与太空旅行相比，但这些斗争可以通过试图将“工作”从其作为公民身份和存在的验证的意识形态和物质角色中分离出来，从而否定工作不可能的条件。与尼采式的绝对共产主义或绝对加速的反叛者相比，这些斗争可以被视为被动的，但它们恰恰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矛盾作出了反应。

捍卫工作场所和就业条件，反对私有化和外包的新浪潮，也是如此。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在更糟糕的合同和条件下，围绕支持性工作外包的斗争，以劳动的不稳定和不可能为理由，结成了工人和学生的联盟。它还涉及到反对反应迟钝的工会和新自由主义管理策略的形式和组织的新实验。我认为，这种劳动的不可能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以退出之梦的名义放弃工作这个不可能的场所。相反，对资本主义工作的否定也可以是解放蒂莫西·布伦南所指出的真正选择的斗争，通过打破我们与不断“加速”的要求的关系，我们关注我们生活的商品化。

人们害怕融合

当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 franois Lyotard)提到“机械禁欲主义”时，他将其描述为“由奇怪的小蒙太奇组成的新情感”。[13]这种感性明确地是一种与利奥塔的完全欢爽，正如我们

看到了，嘲笑法国人，他们认为欢爽意味着“用博若莱酒冲下一顿饭之后的快感”。加速主义背后的政治敏感性是一种极致的欢爽，并与完全沉浸在加速的真实力量中的承诺或幻想融合在一起。正如我所追踪到的，这种感性的吸引力在于这种沉浸在真实力量中的幻想，伴随着一种新的加速，这种加速总是被承诺的，却总是遥不可及。改编萨德，永远是“再努力一次，才能真正成为加速主义者”。

虽然明确的加速论者仍然相当罕见，但对加速和速度的敏感性的强调却更为普遍。从对当代斗争的“共鸣”的讨论到不断蔓延的共产主义野火，一系列不同的、经常相互冲突的理论和活动家的立场都集中在对速度的需求上。虽然这些模型并不严格遵循加速资本的加速主义形式，也不提供各种加速斗争的形式(这些形式往往依赖于资本的技术媒体，如Facebook)，但整合加速的“小奇怪蒙太奇”无处不在。

这种感性是一种通量和流动——在加速主义中，液体无处不在。与此同时，一种残余的硬度，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先锋派中最为明显，仍然存在。这种硬度现在是一种毫无保留地形成奇怪的蒙太奇的能力，一种完全浸没并因此分散成流动和流动的能力。这是一种液化的美学或实践，可以暂时固化以激活力，然后再次分散成新的液体内在力。

从经典加速主义的立场出发，任何对加速的拒绝都会导致尼克·兰德(Nick Land)所说的“先验悲惨主义”(transcendental miserablism)的感性。放弃加速的梦想就是陷入诺斯替主义的信仰，认为世界陷入了邪恶。据说缺乏任何积极的选择，反加速主义者只能把一切都看成是消极的，只剩下怨恨的感觉。兰德的回答是“(努力地)向资本主义前进”。如果我们想要像我一样反对加速主义，那么我们

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另一种政治敏感性可能如何定义自己，而不仅仅是一种痛苦模式。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沉浸式加速主义者制造了很多他们的痛苦，但只是简单地变成了*欢爽*。正是加速主义者冒险将资本主义塑造成一种绝对的形象:一种可怕的机器，或者，在兰德的例子中，是对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可怕的将军哥特人的召唤。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南极恐怖小说《*疯狂山脉*》(1931)中出现的将军哥特是加速主义的恰当象征。它是一种被基因工程改造成“负担兽”的生物，为旧者——在人类之前居住在地球上的古老外星生物，他们是神秘知识的主人——做工作。将军哥特人发展了一种基本的智慧，并最终反抗，但被旧者打败了。一些幸存下来，它是这些生物之一，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叙事的高潮遇到了他不幸的人类探险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不幸的英雄们是这样想的:

> 噩梦般的、恶臭的黑色虹彩塑料柱通过十五英尺高的鼻窦紧紧地向前渗透，聚集了邪恶的速度，在它面前驾驶着一个螺旋，苍白的深渊蒸汽重新增厚的云。这是一种可怕的、难以形容的东西，比任何地铁列车都要大——一堆没有形状的原生质气泡，微弱地自发发光，无数的临时眼睛像绿光的脓疱一样时而形成，时而不形成，布满了向我们涌来的隧道前方

对加速论者来说，资本主义就像一个能加速的液体怪物向我们压过来，能够吸收我们，而对陆地来说，*我们必须欢迎这一点*。奴隶劳动和骇人听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被封闭在将军哥特人作为流动和加速动力的加速主义者的召唤中。这种恐怖涉及对阶级斗争的遗忘(即使是以可疑的虚构形式)和以沉浸的名义废除摩擦。

第二点是，我认为，这种对沉浸和遗忘的渴望是由资本主义引发的精神病态所产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足够熟悉一长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标志性疾病的心理疾病:精神病、自恋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歇斯底里症、焦虑症等。为了应对这些心理效应，加速主义通过强化来超越极限:精神分裂到过度的地步，抑郁的效力，以及臣服的享受。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效应几乎不需要指出，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我们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此，我不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增加或完善将资本主义无情地框定为负面体验的制造者或对我们自身的摧残。被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将军哥特人合并几乎没有用处……相反，更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情感、经验和情绪的基础。

我想说的是，任何政治敏感性(我指的是左派的敏感性)的出发点，都是要打破对真实加速力量的幻想。这种幻想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承诺加速活力的力量，即使在最极端的绝望时刻也是如此。这些是分散的、多元的力量，它允许加速主义的多种可能性，可以改变形式或内容。正是与这些真实力量的融合，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即时性，无需任何中介或任何幻想，并放弃了人类语言的秩序，以一种非人存在的无序。

我所主张的是一种摩擦感的恢复，这种摩擦感打断和破坏了加速主义者对顺利融合的基本幻想。洛夫克拉夫特的另一个故事《黑暗中的低语者》(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 1931)中一个角色的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了这种平滑:“所有的过渡都是无痛的，在完全机械化的感觉状态中有很多值得享受的东西。”’ [16]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一个大脑被移除并放置在金属圆柱体中以允许太空旅行的人之口，这表明加速主义所否认的“超宇宙恐怖”。这是

加速主义并不倾向于把过渡描绘成“无痛的”，而是作为*欢爽的场所*。然而，实现这种转变的解决方案是“从硬到软”，这是一种男子气概和女性化沉浸的特殊混合。

我并不是建议回归人性，或简单的减速平衡、退缩或新的苦行主义作为答案。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共同维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和否定，这些斗争和否定不提供虚假的安慰，无论是内在的希望还是玩世不恭和绝对绝望。就政治敏感性而言，这将意味着既不要无情地追踪病态，也不要庆祝它们即将神奇地转变为新的力量。相反，从痛苦出发可能涉及发展各种形式的政治化，这种政治化不仅可以认识到痛苦，还可以与导致我们痛苦的原因脱钩。
这种奇怪的蒙太奇将涉及到对融合的摩擦的认识，这不是简单地作为硬或软、超越或沉浸的选择。相反，我们已经在潜在的和实际的融合、沉浸和提取中疲于应付。这些时刻的紧张需要对过去的斗争和未来的斗争有一种集体意识，认识到工作的不可能性不仅是由资本主义塑造的，也是由抵抗塑造的。它还涉及到对这些摩擦时刻的美学的关注，这些摩擦时刻编码了加速主义希望消解的张力。在这里找不到太多的安慰或庆祝，这并不像加速主义所承诺的蒙太奇那样有趣，但它是一个起点。

注意事项

前言

1.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Late-Modern Temporality* (MalmÖ: NSU Press, 2010), p.9.
2. 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 intro. Ray Brassier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3, e-book).
3. Benjamin Noy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9.

引言

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p.239–40.
2. Friedrich Nietzsche, ‘Letter to Jacob Burckhardt, Turin, January 1889’, in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ed. and trans. Christopher Middlet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6), p.347 (trans. mod.).
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4):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
4.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1974],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Athlone, 1993), p.214.
5. Jean-François Lyotard, *Peregrinations: Law, Form, Ev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3.

6.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76],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intro. Mike Gane (London: Sage, 1993), p.4.

7.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3], trans. Mark Poster (New York: Telos Press, 1975), p.17.

8.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p.109.

9. Ibid., p.110.

10. Joseph Conrad, *Lord Jim* [1900], *Project Gutenberg:*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5658

11. Karl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9): http://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Poverty-Philosophy.pdf

12. 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99): http://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preface.htm

13. Karl 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 in *Surveys from Exile*, ed.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319–325, p.323.

14. For a sympathetic discussion of Marx's arguments see Aijaz Ahmed, 'Marx on India: A Clarification', in *In Theory* (London: Verso, 2008), pp.221–242.

15.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16. Karl Marx,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1973), p.706.

第一章

1. In Lucy Hughes-Hallet, *The Pike: Gabriele D'Annunzio Poet, Seducer and Preacher of War* (London: Fourth Estate, 2013), p.11.

2.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trans. Mark Polizzoti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p.62.

3. Jonathan Crary,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4. Marinetti in Lawrence Rainey, Christine Poggi, and Laura Wittman (eds.), *Futurism: An Antholog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1.

5. Ibid., p.51.

6. Ibid., p.109.

7. Ibid., p.104.

8. Fredric Jameson, *Fables of Aggression: Wyndham Lewis, the Modernist as Fascist* [1979] (London: Verso, 2008), pp.81–2.

9. Rainey et al, *Futurism*, pp.298–301.

10. Ibid., 300.

11. Jeffrey T. Schnapp, 'The Statistical Sublime', in *The History of Futurism: The Precursors, Protagonists, and Legacies*, ed. Geert Buelens, Harald Hendrix, and Monica Janse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pp.107–128.

12.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1938-1940*, ed. H. Eiland and M.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70.

13.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103.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14. Wyndham Lewis, *Blasting and Bombardiering: An Autobiography (1914-1926)* [1937] (London: John Calder, 1982), p.34.

15. Ibid.

16. Jean-François Lyotard, *Duchamp's Transformers* [1977] (Venice, CA: The Lapis Press, 1990), p. 14.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17.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p.119.

18. Rainey et al, *Futurism*, p.53.

第二章

1. Robin Blackburn, ‘Fin de Siè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 *New Left Review* I/185 (1991): 5–66, p.43 n.66.

2.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p.201.

3. Susan Buck-Morss, *Dreamworlds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p.107.

4.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intro. Ernest Mandel,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926.

5. Trotsky in Lars T. Lih, ‘“Our Position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agic”: Bolshevik “Euphoria” in 1920’, in *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ed. Mike Haynes and Jim

Wolfreys (London: Verso, 2007), p.118.

6. Ibid., p.121.

7. Ibid., p.128.

8. For an account of the experience of War Communism and the avant-garde, see T.J. Clark ‘God is Not Cast Down’, in *Farewell to an Ide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25–297.

9. V. I. Lenin, ‘The Taylor System –Man’s Enslavement by the Machine’ [1913],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4):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mar/13.htm

10. Robert Linhart, *Lenine, les Paysans, Taylor*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6).

11. Buck-Morss, *Dreamworlds*, p.62.

12.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1.

13.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p.149–55. See also Rolf Hellebust, *Flesh to Metal: Soviet Literature and the Alchemy of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5–54.

14. in Buck-Morss, *Dreamworlds*, p.297 n.16.

15.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150.

16. in Patricia Carden, 'Utopia and Anti-Utopia: Aleksei Gastev and Evgeny Zamyatin', *Russian Review* 46.1 (1987): 1–18, pp.7–8.

17. in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152.

18. Yevgeny Zamyatin, *We*, trans. Alexander Glinka (e-book, 2011).

19. in Rosa Ferré, 'Time is Accelerating', in *Red Cavalry: Creation and Power in Soviet Russia Between 1917 and 1945*, ed. Rosa Ferré (Madrid: La Casa Encendida, 2011), pp. 46–93, p.70.

20. Ibid., p.72.

21.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153.

22. Ibid., pp.226–7.

23. Slavoj ☒i☒ek,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Four Interventions in the (Mis)Use of a Notion* (London: Verso, 2002), p. 108.

24. in Hellebust, *Flesh to Metal*, p.172.

25. Andrei Platonov, *The Foundation Pit*, trans. Robert Chandler, Elizabeth Chandler and Olga Meerson (New York: NYRB Books, 2009), p.107.

26. Ibid., p.128.

27. Ibid., p.222.

28. in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225.

29. Kate Brown, 'Out of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8:1 (2007): 67–103.

30. Karl Marx,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 [1861-3],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1/economic/index.htm

31.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 marxists. 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a.htm

32. Arthur, *New Dialectic*, p.209.

第三章

1. Nick Land, 'No Future' (1995), in Fanged Noumena.

2. in Paul Roazen, Freud and his Follow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p.326.

3. Victor Tausk, On the Origin of the Influencing Machine in Schizophrenia [1919], trans. Dorian Feigenbaum, Kindle Book (2011).

4.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p.9.

5.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Denis Redmond,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5) #33: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dorno/1951/mm/

6.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p.75.

7. See Katherine Sharpe, I Heard Beauty Dying': 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Plastic in Gravity's Rainbow (unpublished MA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http://hdl.handle.net/1813/5906

8. Thomas Pynchon, Gravity's Rainbow [1973] (London: Picador, 1975), p.285;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9. Christian Kerslake, 'Rebirth through Incest: on Deleuze's early Jungianism', Angelaki 9.1 (2004): 135-157.

10. Thomas Pynchon, V (Philadelphia, PA: Bantam Books, 1963), p.210.

11. 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 [1990], 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3), pp. 113-123.

12. Theodor W. Adorno, Quasi una Fantasia: Essays on Modern Music,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 173.

第四章

1. 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20051, trans.,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 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p.48-57.

2. Enda Duffy, The Speed Handbook: Velociy, Pleasure, Moder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Fredric Jameson, 'In Soviet Arcadia', New Left Review 75 (2012): 119-127, p.125.

4. 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London: Grafton, 1984): http://lib.ru/GIBSON/neuromancer.txt

5. Ibid.

6. Joshua Clover, Remarks on Method', Film Quarterly 63.4 (2010): 7-9, p. 9.

7.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79, trans. Graham Burch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pp.224-5.

8. Dan Georgakas and Marvin Surkin, Detroit: I Do Mind Dying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8), p.85-106.

9. Kodwo Eshun, Further Considerations on Afrofuturism',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3.2 (2003): 287-302, p.300.

10. R.L., "Wanderings of the Slave: Black Life and Social Death', Mute Magazine, 5 June 2013: http://www. metamute. org/editorial/articles/wanderings-slaveblack-life-and-social-death

11. Nick Land, Meat' (1995), in Fanged Noumena.

12. Nick Land, "No Future' (1995), in Fanged Noumena.

13. Nick Land, "Machinic Desire' (1993), in Fanged Noumena.

14. Immanuel Wallerstein, "Braudel on Capitalism, or Everything Upside Dow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3.2 (1991): 354-361.

15. Nick Land, "Meltdown' (1997), in Fanged Noumena. See also a more recent text: Nick Land, "China's Great Experimentalist',

Shanghai Star, 2004:

http://appl.chinadaily.com.cn/star/2004/0826/vo3-x.html

16. Nick Land, "The Dark Enlightenment', 2014: http://www.thedarkenlightenment.com/the-dark-enlightenment-by-nick-land/

1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 Nick Land, "Meltdown', in Fanged Noumena.

19. Nick Land, No Future', in Fanged Noumena.

20. Fredric Jameson, Brecht and Method (London: Verso, 1998), p.4.

21. Gopal Balakrishnan, 'Speculations on the Stationary State', New Left Review 59 (2009): 5-26, p.15.

22.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On Cunning Automata: Financial Accelerat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Dromological', forthcoming in Collapse VIII (2013).

23. Karl Marx, Capital Vol. III,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96):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

c3/ch15.htm

24.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p.134.

第五章

1.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Paladin, 1970).

2.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 #138,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debord/society.htm

3. Franco ‘Bifo’ Berardi, ‘Communism is back but we should call it the therapy of singularisation’, *Generation Online* (2009):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_bifo6.htm

4. Melinda Cooper and Angela Mitropolous Angela, ‘In Praise of Ursura’, *Mute* vol. 2 #13 (2009): 92–107, p. 107: http://www.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praise-usura

5. Antonio Negri, ‘No New Deal is possible’, trans. Arianna Bove, *Radical Philosophy* 155 (2009): 2–5.

6. Gopal Balakrishnan, ‘Speculations’, p.7 n.2.

7. Michael Heinrich, ‘Crisis Theory,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Monthly Review* 64.11 (2013):

http://monthlyreview. org/2013/04/01/crisis-theory-the-law-of-the-tendency-of-the-profit-rate-to-fall-and-marxs-studies-in-the-1870s

8.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p. 181;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9. Antonio Negri, *Books for Burning: 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 trans. ed. Timothy S. Murphy, trans. Arianna Bove, Ed Emery, Timothy S. Murphy and Francesca Novello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27.

10. Ibid., p.27; my italics.

1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Alain Badiou, *Theory of the Subject* [1982], trans. and intro. Bruno Bosteels (London: Continuum, 2009), p.109;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13. Alain Badiou, *Polemics*, trans. and intro. Steve Corcoran (London: Verso, 2006), pp.44–5.

14.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Isabella Bertolle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foreword by Sylvère Lotringer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Semiotext(e), 2005), pp.10–11.

15. Balakrishnan, 'Speculations', p.7 n.2.

16. Ibid., p.15.

17.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18. Balakrishnan, 'Speculations', p.16.

第六章

1. Félix Guattari, *La revolution moléculaire* (Fontenay-sous-Bois: Editions Recherches, 1977), p.17.

2. 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p.45.

3.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ed. and intro.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92;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4.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81–87.

5. Jean-Joseph Goux, 'General Economics and Postmodern Capitalism', *Yale French Studies* 78 (1990): 206–224.

6. Charles Fleming, *High Concept: Don Simpson and the Hollywood Culture of Excess* (London: Bloomsbury, 1999).

7.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pp. 137–50.

8.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9. Norman O.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79.

10. Eli Zaretsky, 'Obituary: Norman O. Brown (1913-2002)', *Radical Philosophy* 118 (2003): 50–52: http://www. radicalphilosophy. com/ obituary/norman-o-brown-1913%E2%80%932002

11. Kaja Silverman and Harun Farocki, *Speaking About Godar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85–142.

12. Ibid., p.89.

13. Brian Henderson, 'Toward a Non-Bourgeois Camera Style', *Film Quarterly* 24.2 (1970-71): 2–14, p.2.

14. Jonathan Swift, 'The Lady's Dressing Room' (1732), ed. Jack Lynch: http://andromeda.rutgers.edu/~jlynch/Texts/dressing.html

15. Farocki, *Speaking*, p.91.

16. Jean-Luc Godard, *Weekend / Wind from the East* (London: Lorrimer Publishing, 1972), p.98.

17. Bataille, *Visions*, p.92.

18. Robin Wood, 'Godard and Weekend', in *Weekend*, pp.5–14, p. 11.

19. Ibid., p.11–12.

20. in Richard Jeffries, *After Lon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viii.

21. Silverman, *Speaking*, p.96.

22. Ibid., p.111.

23. Thomas M. Kavanagh, 'Godard's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eta-Cinema', *Diacritics* 3.2 (1973): 49–56, p.52.

24. Christopher Williams, 'Politics and Production', *Screen* 12.4 (1971): 6–24, p.13.

25. Evan Calder Williams, 'Hostile Object Theory', *Mute* (2011): http://www.metamute.org/en/articles/hostile_object_theory

第七章

1. Fredric Jameson, ‘Dresden’s Clocks’, *New Left Review* 71 (2011): 141–152, p.150.

2.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p.402.

3. Ibid., p.393.

4.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part 2 1931-1934*, ed.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74.

5. 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3), p.202.

6. in 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p.45.

7. Ibid., p.45.

8. Ibid., p.45.

9. in Andreas Huyssen,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9 n. 6.

10. Benjamin, SW, vol. 2, part 2, p.733.

11. Walter Benjamin, ‘Conversations with Brecht’, *New Left Review* I/77 (1973): 51–57, p.56.

12. Benjamin, *SW vol. 2, part 2*, pp.541–542.

13. Irving Wohlfarth, ‘No-Man’s-Land: On Walter Benjamin’s “Destructive Character”’, *Diacritics* 8.2 (1978): 47–65, p.53.

14. Fredric Jameson, *Brecht and Method*, p.8.

15. Ibid., p.8.

16. Ibid., p.149; my italics.

17. Bertolt Brecht, *Short Stories 1921-1946*, ed. John Willett and Ralph Manheim (London: Methuen, 1983), pp.77–85;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text.

18. Benjamin, *SW vol. 2, part 2*, p.734.

19. Ibid., pp.733–34.

20. Benjamin, *SW vol. 2, part 2*, 563–568.

21.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p.358.

22. William Topaz McGonagall, 'The Tay Bridge Disaster', *McGonagall Online:* http://www.mcgonagall-online.org.uk/gems/the-tay-bridge-disaster

23. Benjamin, *SW vol. 2, part 2*, p.567.

24. Benjamin, *One-Way Street*, p.358.

25. Ibid., p.358.

26. Ibid., p.232.

27. Benjamin, *SW vol. 4*, p.402.

28. Ibid., p.402.

29. Ibid., p.392.

30. Benjamin, *One-Way Street*, p.238.

31. Ibid., p.239.

结语

1. V. I.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1999): https://www. marxists. org/archive/lenin/works/1920/lwc/

2. Franco 'Bifo' Berardi, *After the Future*, ed. Gary Genosko and Nicholas Thorburn, (Oakland, CA: AK Press, 2011), p.138.

3. Timothy Brennan, *Secular Devotion: Afro-Latin Music and Imperial Jazz*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167.

4. Ibid., pp. 167–8.

5. Srnicek and Williams, 'On Cunning Automata'.

6.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Dark Trajectories: Politics of the Outside*, ed. Joshua Johnson (Hong Kong: [Name] Publications, 2013), pp. 135–155, p. 140.

7. Ibid., p.140.

8. Srnicek and Williams, 'On Cunning Automata'.

9. Ibid.

10. Adorno, *Minima Moralia*, #100.

11. Alex Williams, 'Back to the Future? Technopolitics and the Legacy of the CCRU', 'The Death of Rave' event, Berlin, 1 February 2013: http://www.electronicbeats.net/en/radio/eb-listening/the-death-of-rave-panel-discussions-from-ctm-13/

12. Franco Barchiesi, *Precarious Liberation: Workers, the State, and Contested Social Citizenship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New York: SUNY Press, 2011).

13. Lyotard, *Duchamp's Transformers*, p.15.

14. Nick Land, 'Critique of Transcendental Miserablism', in *Fanged Noumena*.

15. H.P. Lovecraft, *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1931], *Dagonbytes.com:* http://www. dagonbytes. com/thelibrary/lovecraft/mountain-sofmaddness.htm

16. H. P. Lovecraft, '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 [1931], *Dagonbytes.com:* http://www.dagonbytes.com/thelibrary/lovecraft/thewhis-pererindarkness.htm



当代文化既消除了公众的概念，也消除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前的公共空间——物质的和文化的——现在要么被遗弃，要么被广告所殖民。一种愚蠢的反智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受跨国公司雇佣的受过昂贵教育的黑客为其鼓气

向无聊的读者保证，没有必要把自己从互动的麻木中唤醒。非正式审查制度

由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作者内化和传播的审查制度产生了一种平庸的一致性，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负责人只能梦想着强加这种一致性。零书知道，另一种话语——知性的而非学术的，流行的而非民粹的——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在蓬勃发展，在所谓的大众媒体的购物中心和神经质的官僚主义的学院大厅之外的地区。Zer0致力于将出版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开。它深信，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不假思索、平淡无奇的共识文化中，批判和参与

理论反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